



《记忆》132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三）

【评论】

华新民 读扬子浪《文革日记》有感

【专稿】

扬子浪 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

【评论】

读扬子浪《文革日记》有感

华新民

谢定国（笔名扬子浪）是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作研究生时的校友。当年国门初开，刚到时校园里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人数不超过一打，都相互熟识。我跟他都是1962年从上海考到北京上大学，又是同一年进UCSD读书，经历相似，所以属于互相很谈得来的朋友，但是忙于学业，并没有深谈各自在中国的经历，后来毕业离校，就各奔东西，来往不多了，还有过短暂的联系中断。

几年前他告诉我手上还保存着自己在文革初期的日记，引起我的兴趣，觉得那将是有价值的史料，不过也没有指望他能将它公诸于众。毕竟，日记属于个人的隐私，文革中的日记，必定有许多今天的人看来可笑甚至可鄙的记载，是否公开只能出于本人完全自愿的决定，旁人是不宜施加任何影响的，所以，后来这件事也就淡忘了。然而，几个月前他作了将其公开的决定并给我发来了日记的影印件，阅读之后，愈加觉得这是很珍贵的史料。

文革参加者即使曾写有日记的话，也难于保存到文革后。原因是文革中的个人或派别起起落落，几乎都有过整人和被人整的双重经历或者处于派别对立的状态中，抄家又是当时常见的“革命行动”，为了防范被对方抓到把柄，常常在危险来临前把日记等文字材料先行销毁。所以保存到文革后的日记，就像是地层里的生物化石一样，经历了地质年代的沧海桑田，只有在特殊的有利条件下才会保存下来。谢定国的日记，也是由于一些特定条件才得以保存到今天。这里的有利条件，除了日记主人的历史责任感以外，还包括他所在的北京大学的特殊状况。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一开始就直接控制了北大的运动——在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几天后，毛就给予了支持。在后来的工作组问题上，江青带领中央文革的人走在其他学校之前给北大的工作组定了调子，聂元梓也立刻紧跟。所以聂元梓为首的主流派在北京大学有相当强大的优势，谢定国恰好是这个主流派的一员，所以能相对安然地度过文革的最初几年，而没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也就没有销毁日记的恐慌心理。

文革日记能保存到今天，已经属于稀少，保存到今天而又愿意公诸于众的就更少了。这方面比较引人注意的有香港出版的原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和原北大哲学系学生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宋柏林、陈焕仁和谢定国都是文革期间的主流派——至少是最初几年——所以日记能够留存到今天。其中陈焕仁的日记同谢定国日记尤其相似，日记的主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个在哲学系，一个在数力系。都是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的活跃成员。陈焕仁的日记比较齐全，覆盖了他亲历北大文革的全部时间约46个月。它于2005年末出版，后来陆续有人指出其中存在整理过程中的改动痕迹，不免影响到它的可信度和对文革研究的价值。比较起来，谢定国日记没有那么齐全，只覆盖了1966年8月到1968年2月的19个月时间。这个时段之前的日记已经遗失，而在这个时段之后，由于日记主人“对文革的前景感到幻灭，又不敢在日记中记下任何怀疑和政治不正确的想法”，因而停笔。但是谢定国在整理这些日记的过程中，把改动限制到最小的程度。据我对整理后的文稿和影印的日记原文对照，只有与运动无涉的“大串联”中的一些游山玩水描述被略去，其余均保留日记原貌。

正由于文稿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真实性，阅读一篇篇日记，使笔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回到了当初“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例如1966年8月5日的日记中，主人对江青和康生、陈伯达有许多崇拜赞扬的话，他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江青的讲话：“感情炽烈”、“干脆利落不带任何折衷主义”、“有着千军万马的力量”。看到这些谀词笔者不免汗颜——不是替作者汗颜，而是为自己汗颜，因为笔者在1966年的下半年里也是中央文革的崇拜者。江青等人以前在报刊上不大露面，文革一出场就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记得看过一张传单，这样记载陈伯达在北大为那些受工作组迫害的人平反：当时一些激进的学生有一句口号“一切权力归左派”，被工作组打成反动口号。陈伯达替学生平反时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上写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怎么说“一切权力归左派”就是反动口号呢？在我们这代人所受的教育中，法律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从来就是用来惩罚无权者的，属于林彪所说的那种“镇压之权”。而陈伯达在辩论中把宪法抬出来替民众辩护，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公平公正的印象，在当时真的有“千军万马的力量”，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一下子就成了中央文革的拥趸。许多年后，杨小凯在回顾这段历

史时说，毛泽东及中央文革为了发动群众斗争“走资派”而打了一张“民主牌”。毛泽东一生大概只打过两次“民主牌”，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对付国民党，一次就是文革初期对付自己党内的同志。这张牌杀伤力巨大，也容易伤到自己，所以一旦达到目的，就立刻收回。被它鼓动起来的杨小凯们（包括谢定国和笔者）是付出了轻重不等的代价后才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受人利用。日记主人留下了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历史片断的真实记录，今天面对并公布这段历史不免令自己尴尬，需要足够的勇气。

这样的历史片断在谢定国日记有许多，也是日记的价值所在，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底层学生对日记覆盖的这段时间内历史事件的观察。其中有些片断也许不为别人注意，但是对笔者却有特别的意义。例如，日记生动记载了1967年4月5日清明节联动分子在八宝山举行活动后在颐和园遭到首都红代会的造反派红卫兵围剿的情景。这勾起了我脑海里早已尘封的关于一起“反标案”的记忆：我就读的中国科大校园与八宝山革命公墓相邻，就在那年清明这几天，学生食堂内发现了一张写有“反革命标语”的小字条，内容是支持刘少奇立即召开“九大”的要求，质问毛泽东敢不敢。当时多数人都认为这只能是知道中央内部斗争的老红卫兵干的——他们到八宝山来向死去的前辈哭诉“江青阿姨”对他们的迫害之后，顺便到科大校园里发泄一点对毛的怨恨。这个案子后来不了了之，却让我校的一些同学受到怀疑和调查，影响了他们的毕业以至后来的人生道路。

这方面还有一个例子：1967年2月27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毛主席在最近与张春桥同志的谈话中一再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绝对错误的，反动的。”这段话让我又一次回到那个年代——我在1968年毕业分配的时候被军宣队和工宣队扣留了半年作检讨，检讨内容之一就是我在1966年的秋冬之际曾参与过一篇大字报的撰写，其中提出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经过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人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大民主”口号的鼓励下，揭露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许多阴暗面。这些揭露一方面激起了群众对“走资派”的痛恨，另一方面也在学生中引发了一股“新思潮”，反思这些阴暗面背后的制度性原因，提出了“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其他一些口号。就像今天人们看到那么多大老虎被揭露之后，探索如何治本的对策，是再自然不过

的事情，所以开始的时候，这股思潮在学生中相当有市场。然而，“大民主”的这一后果，显然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所以不久之后，就被中央文革批判为“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甚至还在1966年12月抓捕了几个代表人物（伊林·涤西等）。

这件事在文革洪流中或许只是一个小浪花，却波及到本人的毕业分配。近年回想此事，始终想不起“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良性”的意见为什么成了“反动思潮”？如此不讲理的定性源自何人？谢定国的日记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些线索：这个定性看来直接来自毛泽东——他深知“民主牌”会伤及自身的危险，密切注意它在青年学生中的反响，“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类口号的出现，或许是提醒他收回“民主牌”的信号之一，采取措施大约发生在1966年末。

但是，打“民主牌”需要在报刊上大张旗鼓，收回它则宜以波澜不惊的“内部讲话”方式进行，所以毛的定性没有作为“最高指示”公布，而是先由中央文革抓人，再慢慢透露到社会上，两个月后传到北京大学。这样做，也像私下里撤销对“二十世纪北京公社”的鼓吹而改称“革命委员会”一样，使得毛泽东收回“民主牌”的过程不致过于突兀而引起“出尔反尔”的联想。

以上只是引起笔者个人兴趣的两个例子，事实上，谢定国的日记记载了更多人所共知的重大的事件以及他个人的评论，如上海“红革会”炮打张春桥、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及姚登山、林杰以及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垮台等等。还有一些记载是公众未必关注，但是对文革研究者有价值的内容，例如：1967年4月9日记载的“民族文化宫”抢档案事件，以及后来发展为北京高校“天”“地”两派间的斗争；7月2日的日记记载了“地院的几个兵团，公布了朱成昭及其同伙的反动言论的第一批材料，触目惊心。”

此外，日记主人对文革时期北大校内外有影响的人物如聂元梓、郭罗基、牛辉林、孙蓬一、吴传启、蒯大富、韩爱晶等人的评论，对校内反对派“井冈山”和杨勋、樊立勤等人的讨伐，对乔兼武、“虎山行”、李洪山、伊林·涤西等人的批判，也会是研究者有兴趣的内容。

日记除了记载了文革中大小事件的所见所闻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它有大量篇幅纪录了个人所思所想，包括许多自我批评和真诚反省的内容。看得出来，当年的日记主人是个有进取心，但是又背着家庭出身包袱的青年，不愿意做“历

史的庸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时常在在日记中解剖和激励自己，批评自己的犹豫和软弱。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作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判断是非的依据，或者用今天的说法，他的思想资源，这也是研究文革时期青少年学生心理有价值的资料。

从日记来看，主人对毛泽东极为崇拜，称之为“使太阳都黯然失色的人物”和“握着历史缰绳的高超骑手”，对毛的著作、语录、诗词以及文革中流传的毛泽东内部讲话等等，都怀着崇高的敬意来学习领会，对反映毛泽东指导方针的文件如《五一六通知》、报刊文章如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及以中央文革为主的领导人的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也十分认真学习和紧跟。他当年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林彪同志及其他革命派的中央同志，才紧跟毛主席跨入了马列主义发展的三个大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而刘少奇呢则由停滞走向了彻底背叛。”毛泽东思想无疑是他思想资源中最基本的底色，这当然也是当时青少年的普遍思想状态。而这种思想状态也是毛泽东能够成功引导他们投入文革运动的一个条件。

这种思想状态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成果。从小学到大学，中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里的灌输，以及日常接触到的报刊杂志、文艺演出，无不围绕着上述方针，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为目标。这种教育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效果显著，在这本日记中褒贬的正、反面人物中可见一斑：日记主人引为学习榜样的有青年毛泽东、小说《红岩》里的英雄以及苏联女英雄古丽雅。他所厌恶的人物则包括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和“三十年代的吴晗”。《多余的话》当时正遭受猛烈的批判，瞿秋白也成为他鄙视的对象。日记也记载了对刘少奇及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这种批判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高潮，该文是1967年5月8日发表的，而日记主人走在了前面，早在1月3日就写了批判文章。可见，这种批判不是应景式的人云亦云，而是作者真诚信奉当时主流思想的体现。

卡玛的文献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主要采访文革时的中学生，突出了文艺作品如苏联流行的小说《牛虻》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对他们思想的影响。

作为大学生。日记主人的涉猎稍微广泛一点，阅读过的文艺作品除了中国小说《红旗谱》等，还读过当时被认为带有修正主义倾向的苏联文学作品，如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及中国“反修”以后推介出版的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看过的电影有供批判用的毒草《舞台姐妹》，还有《列宁在十月》和《誓言》、《波罗的海代表》等苏联电影。对于刚刚过去的“旧社会”，他的不少历史知识来自于当时的一些“内部读物”：阅读唐人的《金陵春梦》使他“获得大量历史资料，历史知识，得益匪浅”，阅读《西行漫记》让他“欣喜若狂”。从这张单子里，反映出日记主人的思想资源的单一和偏狭。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思想资源的偏狭，不是日记作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的问题。笔者和日记主人同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但进入学校已经是五十年代了，可以算是完整接受了新政权下主流教育的第一代人。比我们早出生的人，包括那些老共产党人，在家庭里和社会上接受中国旧传统的启蒙，如果上学的话，在按英美模式创办的学堂里多少接受过西式教育。而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前，社会氛围完全改变，学生喝的是高纯度“狼奶”——旧传统总是同“封建糟粕”相提并论，西方文明几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上虽然还没有完全禁绝，都被告知要警惕其中“毒素”。日记中提到英国首相艾登回忆录，评论是：“意思不大”。至于莫泊桑中短篇小说，虽然“有几篇相当奇异，有思想”，还是不忘批判其中“黄的，粉红色的，灰色的东西。”结果，日记主人当作“正能量”接受的外来文化，几乎全部来自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到肖洛霍夫的苏俄。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开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在政治外交领域以外，苏俄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资源的单一，或许可以解释，当九十年代苏联解体的时候以致到今天，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会如丧考妣。因为这些人——包括当年曾经的“反修战士”及其传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养分都是从苏联那条根里吸取的。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时期的思想禁锢，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因为在本届和上届的中央领导核心里都有着日记主人的同龄人，从胡锦涛、温家宝、俞正声到刘延东当年也曾是在同样的校园里接受同样教育的大学生，当然也不必讳言，这个群体还包括近年被揭露的“老虎”慕绥新、郑筱萸、李纪周、李嘉廷、陈良

宇、周永康和徐才厚等，这些领导人——不管日后的经历和下场如何——假如当年写日记的话，其中的思想、语言不会同这本日记有大的差异。所以扬子浪的日记对于当代政治研究者也有某种参考作用。

当然，谢定国也像其他青年一样，随着文革的展开，经历过林彪出逃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事件，以及文革后的种种变化，有许多新的认识和反思，尤其是八十年代初出国后有了新的国际视野，接触到了多元的思想资源。笔者从和他的接触中感受到他是一个敏于观察和勤于思考的人。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校园里有五花八门的学生团体和课余的集会，有一次看到一个学生团体在校园里举行活动，反对南非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抗议里根政府对南非政府的姑息态度，在校园里开展“撤资运动”（disinvestment），呼吁美国的企业抵制南非政府，撤回在南非的投资。谢定国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至今还记得的话：“美国学生的觉悟比我们高！”我们是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我完全理解这句话的背后含义：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参加过多次天安门集会游行：抗美援朝、声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等等，每次都是义正辞严、声势浩大，但是全都是上边统一领导、统一布置的。而像美国的学生那样自发组织起来，从事他们认定为正义的活动，我们一次也没有做过。笔者相信，正是这种对事物的观察和思索，使得谢定国能够摆脱过去年代里被灌输的那些思想资源的桎梏，以全新的视角面对过去，以古稀之年的达观和淡定将自己弱冠之年写的日记公诸于众，留作历史的见证，完成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历史使命。■

2014年9月20日

此文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410b

本刊经作者授权转载。

【专稿】

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

扬子浪

笔者在这里公布的是在文革中，在风暴中心北京大学记下的真实日记。

笔者的本名谢定国，1945年生，出身于上海一个普通商业“资本家”家庭。当年每次填出身写这三个字时，觉得特别铜臭，现在再写，想想那些红色权贵豪



富，又觉得特别寒碜。我在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六年制)，1968年12月毕业。毕业证书由北大军宣和工宣队盖章颁发，是一本五寸

(1968年秋，作者摄于毛泽东雕像前，现址为北大图书馆)大小的红色小本。内页是毛泽东的军装像，他和林彪的语录，印制低劣，设计粗鄙，堪称世界高教史上的奇观。扬子浪是我在北大参加文革撰写大字报时用的笔名。我写文革大字报，用的笔名寄情山水，而不是“毛林陈之兵”、“二十八团”等，是我回忆那个荒唐年代时不多的稍感欣慰的事情。

笔者在整理日记时，对明显的错别字，作了更正；还增补了一些标点符号，以利读者阅读。在那些极端亢奋的日子里，笔者有时还把月份搞错，对这些我也作了勘正。日记中牵涉的人物，凡是有可能引起困扰，误解和争议的，我都用了化名。此外有些内容与文革和我当时的思想情绪关系不大的，则作了一些删节。至于文句欠通，断句不妥，用词不准，我则基本保留，因为这些或许也是时代和我当时心境的反映。

可惜的是公布的日记仅起于 1966 年 8 月 5 日 止于 1968 年 2 月 2 日。1966 年 8 月 5 日前的那本日记在多次的搬家迁移中不幸遗失。1968 年 2 月后，则因为北大两派的对立冲突越演越烈，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自己对文革的前景感到幻灭，又不敢在日记中记下任何怀疑和政治不正确的想法，就停笔不记了。

把文革日记公布，是件颇难堪的事，笔者为此犹豫了多年。但随着年岁日增，已近古稀，我自忖与其把它带进坟墓，不如公诸于世，让世人看到一个大学生青年在那个疯狂时代，在风暴中心的情感和思想。他的幼稚和狂热，他的思索和挣扎，他的困惑和迷茫，他如何在绝对权力设下的思想牢笼中东冲西突，企望为现实中发生的非常事件，找到政治正确的合理诠释；这一切既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也是历史 (History)。

笔者也难免自问：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能读懂那个时代的人的日记吗？能理解一个学生青年在那个癫狂年代的情感和思想吗？我不知道。先哲早就讲过，一个人是不可能涉过同一条河两次的，此处和彼次，此河已非那河，何况相隔一个时代。

但渴求被人理解是人最强烈的原始冲动之一，我在这里要多写两段，冀望后人的些许理解。

在一九六五年二月日记中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日记应该记些什么呢？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日记是不能让人看的，因为就像一个人的裸体不能给人看一样。又有人说：日记应该记下一个人的“真实思想情感”，这种提法都是错误的。日记不应该写“真实”，不应该自然主义地描绘人的裸体，这实际上就是提倡兴趣快然、津津有味地记下自己脑子中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活动。日记应该记下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日记应该记下自己在这个伟大时代中丰富多彩的生活，最高目的是向雷锋学习记下自己红色的历史。

很多人在那个年月，记日记就是为了给组织看，是入党入团的思想汇报。更多的人，则是不敢在日记中记下真实的思想情感。因为记下，就是认可，就是向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投降。更何况任何政治不正确的话，一旦被看到，查到都可能带来麻烦。

生物系的樊立勤同学在北大文革中十分活跃、他出足风头，也受尽磨难。在对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谈话时，他说：面对“文革”前夕的高度紧张和非凡压抑，“我宁愿回到‘文革’十年，也不愿意回到‘十七年’”。在严密的党团组织的无空不入的控制下做驯服工具，当一颗没有人性的螺丝钉，还是当文革初期怀疑一切，革命造反的“小毛泽东”（王若望语）？我想那个时代的极大多数青年学生都会和樊立勤一样选择后者，这就是为什么文革宣传一点就着，青年学生革命造反的狂飙在文革初期像热核爆炸一样震撼全国。

文革的发动是驯服工具论的终结，文革的结束则是宣扬阶级斗争和崇拜革命造反的终结，这两个历史的转折都充满了中国历史特有的戏剧性。中国历史的长河或许真如黄仁宇所讲已经冲出了三峡，前面尽管还有曲折跌宕，但已经相对平坦舒缓。

这是我对故国的美好愿望，但我不肯定。历史无绝对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客观规律只不过是她的前身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变种，她们似乎并不存在。

笔者对日记只加了最必要的注释。不熟悉文革历史，北大文革历史的人可能很难把日记中提到的人物，团体和事件连贯起来，特别在日记中又使用了不少略语。如果有读者希望了解更多的日记背景和有关人事的详情，可参阅 Andrew Walder 著的一篇论文“1966-1968 年北京大学红卫兵的派系冲突”。原文是英文，发表在“*China Quarterly*” 2006, 188, 1023-1047. 后由严飞翻译成中文，登在《当代中国研究》Vol. 20, No. 1, 2013。我很惊讶这么一篇详尽的文章居然是一个老外写出来的。尽管其中有些细节有误，但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北大文革回忆录相比，比较全面和客观，实在可以称得起信史。■

一九六六年

8月5日

早晨，空气清新，阳光灿烂。

我又记完了一本日记，我又开始了新的日记，我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我将继续努力，继续前进，与一切资产阶级消极颓废思想作斗争，争取做一个革命者，做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至少做一个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人。

上一本日记记载了1965年11月25日至1966年8月4日250天内在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190天是参加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载，60天是目睹和参加更加伟大，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程有极其深远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作为和思想来说，前190天的记载比较好，而后60天就相对要差劲了。

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还一个都没完成，我还可以弥补损失，我还可以大有作为。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同志努力啊！莫懈怠。

只有紧张的生活才是使人发奋的生活，懒散无所事的生活让人厌倦，他会窒息我的上进心，我的克服困难的革命战斗精神。

让我永远永远记住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战斗诗篇“沁园春”（长沙）吧！

沁园春 长沙 一九二五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昨天晚上8点在东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揭发批判张承先，张德华的错误路线。我们尊敬的朱委员长，诙谐风趣的康生同志，感情炽烈的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出席了我们的会议。大会同学发言结束后，江青同志首先讲话，

她那振奋人心的讲话，干脆利落不带丝毫折中主义的讲话，每个字后面都有着千军万马的力量的讲话，（尽管她讲话的声音并不响）和她富有最强烈的感情表现力的动作都获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江青同志，你对于我们北大同志是多么亲切啊！是你五下北大来，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直接带到了群众之中！

你一开始就要我们警惕张承先，张德华之流挑拨离间的分裂阴谋，号召我们全校革命师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团结起来，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开火。

你劝告工农革干子弟不要听信坏人的流言蜚语，要到群众中去，到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去，不要另立什么协会，这是分裂活动。

你一句手一投足，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为你的演讲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过去习惯于用舞台腔，演员腔指责一些同志装模作样的讲话，而我今天不仅要赞赏你的发言具有最深刻最睿智的政治家的敏锐和思想，并具有一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的风度。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杰出的妇女，甚至从来没想到过如此杰出的妇女，你不愧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人。从你身上发射出的辉煌、灿烂的光芒中，我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讲完后在同学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江青像一个演员一样以180度的发射角，不时地向同学们点头，鞠躬。并且不时地用双手整理头发。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江青同志是一个出色的，演得有声有色的演员。

如果说江青同志是以演员的深刻来表演她的思想的深刻的话，那末康生同志是以朴素、诙谐、出奇不意的反诘显示了他思想的深刻。

康生同志告诉我们是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6月1日下午四点毛主席打电话给康生同志，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且命令6月2日全国报纸一律刊登聂的大字报。康生同志说这下，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因为我是支持聂元梓的。这篇大字报一发表，全北京就炸开了，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真正的群众运动。

康生同志说：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在讲了巴黎公社第一次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炬后，两次指出，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他指出“6.18”后张承先在北大实行的是白色恐怖。6月20日张承先的二十天工作总结和关于“6.18”的情况报告是反革命文件，是

镇压革命的文件。张承先到北大不是来发动群众、来搞革命的，是来扼杀群众运动，镇压革命的。

康生同志当面严厉地责问了张承先，张也就从台中央的凳子上滚到了台边的角落里站在那里了。有一个狂徒竟写条子责问，警告中央首长，说：不准违反毛泽东思想，不准搞逼供信。康生同志机智地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击，揭露，压下了这张条子的气焰。

朱德委员长在大家再三的要求下也讲了话，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已经有些“老”了。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北大两个月的斗争说明了这一点。康生同志还透露毛主席最近给清华的“红卫兵”写了封信号召他们到群众中去，做群众的核心。

陈伯达同志把那幅著名的对联修改了，修改后的对联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

横批：应该这样。

这幅流行了两个月的对联应该换个模样流行了。

昨天开会，江青发言时，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员，文革会宣传部长彭小蒙怒不可遏，跳上台去，抽了张承先一个耳光，然后就用手臂蒙着脸哭了。慌得周围的纠察队员急忙把她按住。大会结束后，张承先、张德华在一片叫打声中，在四个纠察队员的“保护”下夹着尾巴溜走了。

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水很热，又闷，很不安逸，下次应该最好挑下雨天去游，浪大水净人少，比在阴天里在昆明湖这个池塘里泡好多了。

8月8日

昨天章晴丽和她化工学院的两个同学来我校参观，上午我给他们介绍了北大的情况，下午我们四个去清华参观，看到了清华同学给王光美贴的好几张大字报。从清华出来，章的两个同学走了，我和她一起用了晚餐，出来后再在五道口俱乐部，看了电影《白山新歌》。本来一切都很好，但是她突然问我一句你什么出身，我据实答了，我显得很窘迫，她也十分不自然。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胆小怕事懦弱无能呢？家庭的包袱怎么会压得我这样惨呢？难道我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吗？我厌恶极了，厌恶自己如此缺乏革命性。不过我的地位的确也够矛盾的。我要革命，

要一斗，二批，三改，首先要自己站得住脚，如果自己也站不住，那怎么去战斗呢？

不要没有打倒黑帮，反而把自己打倒了。当然旧的应该彻底打倒，但是如果把我的一切都打倒怎么办呢？“怕”的枷锁把我禁锢了。看来我只能去辩论，而没有勇气去闯，去造反，因为我经不起审查。

在生命的历程中一步一步达到了“第四高度”的古丽雅^①，懂得顺水而下的危害性，顺水如行船，终向下游去。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几天，天津、内蒙、呼和浩特、上海都有同学来北大访问、参观，这是真正的学生运动的气象。特别是许多天津同学骑着自行车，从天津来北大，还有许多同学是步行几十里甚至100里来北大的。

8月9日

昨晚8点半，广播了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全校同学欢欣雀跃，表示坚决拥护这一决定。

深夜十一点，我们结队一千余人去人大游行，欢呼中共中央决定，后又至外语学院，直至清晨2点才回校。昨天接到文美一封信，她已经报名去新疆了，不过我想她是不会被批准的，哎！现在是人越青年，框框越少、越敢作为。而我自己给旧文化束缚得很难自由了，在这点上我应该向我的妹妹学习

北大外出的串联同学到处被咒骂，也到处被赞扬。赞扬的围着叫北大革命师生万岁，称我们为“北京公社”宣言的发起者，称北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圣地，全市高等学校的先锋旗帜。地质学院的同学甚至于抄了一首主席诗词送给北大去串联的同学（咏梅 卜算子）。而商学院则是反对的另一个典型。他们贴了许多大字报，驳斥、攻击去串联的物四（一）同学，还呼吁我们广大师生批判物四（一），这些同志不知道，他们反对的绝不只是物四（一），而是广大北大师生，因为我们的观点相同。

8月11日

^① 古丽雅是《古丽雅的道路》的女主角。该书是俄罗斯女作家叶·伊琳娜所著的一部描写苏联卫国战争女英雄古丽雅独特、光荣、有意义的一生的纪实小说。

昨晚去地院和清华，两校的斗争都很激烈，特别是地院更是厉害，在斗争中“东方红”等少数成了多数，各系、各年级纷纷倒戈起义，院原文革委员会看来大势已去。

今天概率论教研室的同志，贴出了他们在八机部抄来的大字报，揭发了流沙与范瑾，张洁清，陆平的关系，及流沙参与破坏北大社教运动的事实。显然这些大字报的矛头也是针对吕正操的。

北大的运动涉及面极广，牵涉到前北京市委，中宣部，高教部，铁道部，八机部与国家科委，乃至河北省委，团中央等机关。因为有二批工作组，六七百名干部，几十名高干在北大复杂的斗争中表现了自己。

8月12日

这几天来北大参观的人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平均每天五万以上，今天完全可能达到十万人。昨晚一食堂，二食堂，三食堂、六食堂，员工食堂，全部住满了人。不算在同学宿舍过夜的，在筹委会登记的就有二千来人，而实际过夜的可能达到五千人。这些人大都是天津、保定等外地大中學生及远郊中学生。

这几天京津公路上，自行车，汽车来往不绝，天津大专学校，中等学校学生，老师大量的涌入北大，听说河北农大、三千余人，一夜功夫就走了一半，全到北大来了。

8月10日晚7:15，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首都革命群众，向全国革命群众发出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遇到了重重的阻力，各式各样党内外牛鬼蛇神感到末日已经来临，他们是不会自行下台的，他们要进行背水一战。但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大革命势如破竹，是绝对不能抗拒的。

今天上午北大二万余师生载歌载舞迎接毛主席著作，在大饭厅举行了隆重的集会，各系也开了欢迎会。文化部代部长肖望东，石西民，李琦来北大讲了话，讲话后北京电视台新影都来拍了片。北京这次共印了十万卷毛选，市委就给我们运来了一万四千卷，这是对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支持。北大被全国来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在北大，我们北大学生成了少数，几乎整天都看不了大字报。以至冯

思慎建议北大同学白天睡觉，晚上看大字报，让外地同学睡觉。北大的确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今天贴了很多团中央的大字报，要求改组。许多外校、外地同学揭发了一些阴谋，一些学校的领导人，工作组当他们被革命群众揭露责问，感到日子快混不下去的时候，就灵机一动，把学生一概放到北大了，这样一来学生兴高采烈，而他们也得以脱身。

收到了洪得炜的来信。

8月13日

下午5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广播后全校立即成了欢乐的海洋，北大和天津各院校的同学在校园里组织了联合大游行。日夜下雨，本来能露天过宿的同学现在都不行了，所有的食堂和教室都住满了人；同学宿舍也住人，我们宿舍加进四人。听说有一个女同学宿舍住了18人。早上去吃饭，或晚上吃饭，食堂已经是葦席满地了，许多中学生横七竖八的躺在那里，这种盛况真是空前绝后！

8月14日

在北大住宿的天津同学在2万人左右。今天至下午6点为止，来北大参观人数已至13万，天津同学达1万人。听说中央市委派了四个人来北大研究这个问题，听说还有几千名同学在京津公路上步行，预计在明天到达，中央已经派车去接。

今天贴了很多河北省委与天津市委的大字报，质向天津市委，居心何在？纷纷指出这是一个大阴谋，天津市委、河北省委的日子混不下去了，因此企图以放行群众，组织反扑，想冲垮北京的文化大革命。

胡乔木已经指出，流传的“柯庆施”的遗嘱是伪造的，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不写自传的，只有个人主义者才写自传。算我倒霉，抄了哪一个浑蛋编写的胡言乱语。在天津保定等市大中学生冲击下，我校运动简直无法进行，整天忙于接待。市委决定，15，16日两天北京大学停止接待。

8月16日

昨晚八点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斗争黑帮分子陆平彭佩云大会隆重召开，大会在工人体育场举行，首都天津保定各大中学校代表，中央各部机关，总参，总政，解放军院校代表，工农兵代表八万多人列席了大会。大会还附设了四个分会场，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李雪峰，王任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大会一直开到清晨一点半才结束。我们四点才回到北大，一夜磅礴大雨把我浇得全身都湿透了。雨季给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麻烦，刚出的大字报被大雨冲掉，大会，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常常被迫在雨中进行。昨夜大会一结束，北京市委就送走了参加大会的2万天津学生，可今天我天津学生好像依然这么多！

今天上午十点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外地来的同志十万人参加，北京大学近两千名同学作为纠察队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始进行得较好，江青主持会议，陈伯达，李雪峰，姚文元，康生讲了话。后来少奇，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林彪同志来了，秩序很乱，挤得厉害，眼看要出大事了。林彪同志在话筒前面站了好一会儿，也没讲，后来江青同志当机立断宣布散会，听说少奇同志还没有下车就驱车回去了。

天津不但大学生来，中学生来，小学生也来了不少。

陈伯达同志说：我们要顶天立地，经得起一切挫折，一切困难，一切磨练，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休息以后的大会开得十分乱，林彪同志在话筒前讲了十三次“同志们，静一静”还是讲不下来。总理亲自走出主席台让包围主席台的同学（从四面八方，甚至从主席台顶盖上面）回去，冒着大雨淋了好一会儿，可没人听。因此江青只好说：“同学们，散会了，我们走了！”

今天上午的会是北京市委与北京大学主办的。两次大会，一些天津同学无理取闹，乱挤一通，挤伤了很多人。特别是今天上午的会议，气得北大附中红旗战士（全部穿的军装）大骂混蛋。

因为天津学生的冲击，北京秩序显得很乱。

8月18日

上午首都群众和各地来的师生百万人集会欢呼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我们昨天几乎整夜未睡，晚11点吃饭，可今天赶到天安门时已经迟了，4点多了。北大队伍经尽了曲折，才到达天安门前。东方红，太阳升，早晨的天安门广场特别壮丽，正在一轮红日喷薄欲出的时候。清晨五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与周围的群众亲切握手谈话，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欢呼雀跃的群众挥手致意。我们伟大的领袖今天身穿军装，显得更加意气风发，豪情盖天地。

然后主席接见了各地大中学校的代表。7点半大会正式开始，陈伯达主持会议，林彪，周恩来总理讲话，聂元梓，彭小蒙和哈尔滨，南京，长沙的中学生代表发了言。大会8点就结束，开始游行。

除了前面四行解放军外，我们的位置可能是最好的了。这一次我看毛主席看得最清楚，实在太好了！毛主席行动还很干净利落，身体很健壮。大会秩序却可能是首都百万人大会中最乱的一次，北大来晚了有责任，外地一些同学没开过百万人大会，不守纪律到处乱撞，也有责任。昨晚，到西语系，收集了一些有关常溪萍的材料，连夜写信寄往于静蕾处。我是昨天收到于静蕾来信的。

晚上看到物理系的一张大字报“为黑帮争取发言权”受到启发，写出了一张大字报“给黑帮以发言权”。当时遭到本班的许多人反对，但我还是贴出去了，且看后果如何。

给黑帮以发言权

（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二）“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彻底的革命者应该自觉地树立对立面，充分揭露矛盾，促成矛盾向革命的方向转化。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需要正面教员，而且需要反面教员，没有反面教员，中国人民的觉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四）黑帮分子要发言，要做反面教员是必然的，是事物本来的辩证法。我们可以给他们发言权，让他们充分曝露自己，让黑帮分子给我们作一个高质量的反面教员。

(五) 革命师生要打“活老虎”。革命人民不畏惧斗争，更不是害怕说理斗争。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必须而且应该轰轰烈烈蓬蓬勃勃地前进。

(六) 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1966年8月18日

8月20日

18日晚法律系的几个同学贴出大字报“揭穿周效亮、谢定国等人的大阴谋”，其余反对的大字报也很多，不过一概点的是周效亮的名。第二天就开始出现支持的大字报了，累计约有七八张，但双方都干劲不足，因此争论也就不了了之了。这几天北大又是一片危机之声了，许多人在叫嚷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处在危机之中。运动又是停止不前。许多人热衷于给筹委会提意见，革命者面前真是有火海刀山，困难重重啊！但有伟大统帅毛主席领路，我们一定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8月22日

历史上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群众的大发动，都伴随着大破坏，革命时期就是千百万群众大表演的时期，就是无数无名氏蜂拥而起，在政治舞台上奇峰突起的时期，也是无数反动派，保守派、政治庸人、凡夫俗子被淘汰被取而代之的时期。目前我们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动，大革命时期。一切革命者，一切真正懂得历史的明智之士都应该欢呼这场大革命。反对这场革命，害怕这场革命就是历史的庸人，就是资产阶级的凡夫俗子。著名的剧本《带枪的人》描写过这样的场景，红军战士，武装的工农赤卫队攻占了一所极端豪华奢侈的官僚大地主庄园，他们在里面住，在里面吃，用最珍贵最稀罕的古董瓷器器皿当小便器，把资产阶级的老爷气得像发疯一样。让他们去暴跳如雷吧！资产阶级的一切看来仿佛是不可亵渎的圣物，在无产者看来一概都是盛粪便的东西。

这场大革命是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只有毛泽东这样天才的革命家才能领导这次革命。我叹服这次革命，我希望能成为历史上无名的革命小将，我急切于成为一个在革命中大显身手的人，我有能力、有智慧、有意志这样做。但我现在却不能大胆行动，我可耻的出身注定我只能甘于现状。我有没有勇气与家庭断绝关

系呢？这样做好不好呢？写大字报，斟字酌句，唯恐给人揪住辫子，有些“敢”的风格吗？

我们最敬爱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这样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势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

如今这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刻到来了！

如今这个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到来了！

如今这个光荣伟大的重担落在我们无产阶级后代的身上了。

在同学间流传着一首主席诗词

卜算子（咏梅）

悼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艾地

疏枝立寒秋，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亦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8月23日

上午北大红卫兵召开了成立大会。

这几天我急于赴上海串联，但苦于没人支持，开不到证明，一个人行动毕竟是不可能的。至于有人骂资产阶级狗崽子，我到是不怕的，我原谅他们，干革命把命豁出去都不怕，还怕人骂！“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一世不干革命，那将是何等乏味啊！

革命的青少年说得好，人生一世就要被人拥护或者被人反对，就要有革命棱角，革命锋芒，要不就是窝囊废！

我想写一份：“叛逆者宣言”彻底甩掉家庭这个沉重的包袱，可是又耽心效果不大。

8月25日

“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太好了！这是篇与“让青春放出光芒”的文章针锋相对的对立面。两文都赞扬了青少年，都赞扬了青春，但却是两篇观点大相径庭的大文章。

应该把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当作最重要的文章来学习。

彪炳显赫的革命雄文

笔力雄健，横扫千军威尚猛

文锋犀利，刺破青天锷未残

革命的小将吼声震天：要革命，要造反！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文化革命的暴风雨，来势凶猛，如泰山盖顶，如怒涛汹涌，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从古以来，敢于闹革命，敢于创新的，大都是“幼稚”的年轻人。他们一抓到真理，就藐视老古董，向老古董宣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但是胜利的总是那些原来名不见“经传”的青年。

革命的辩证法是无情的，那些代表旧势力的人物，看起来似乎是庞然大物，不可一世。但是他们逃脱不了革命辩证法的惩罚。那些代表新生力量的小人物，不管在斗争中将遭受怎样的艰难曲折，遇到多么大的阻力，他们最后必将战胜旧势力。他们是敢于“冲决罗网”的“狂飙”式人物，而不是小心翼翼生怕革命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政治庸人。他们是敢于在革命大风暴中搏击长空的雄鹰，而不是卷缩在屋檐底下的家雀。

8月26日

进城在文联大楼观看了文联的大字报，文联的所有领导人几乎一概被斗了。我觉得很烦闷，耽不下去了，想离开北京。

8月27日

晨，關仁义来京，晚于静蕾及其同学张明芳来校。

8月28日

白天上午与于静蕾，张慧芳，關仁义三人游颐和园，下午去俞颖处。

關仁义还是那付不可救药的狂妄劲、无知与骄傲。于静蕾依然故我，倒是张明芳这个同志显得很有趣。俞颖的话很多，滔滔不绝，看来是一个活动份子。

梁斌的红旗谱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春兰穿着绣有“革命”两字的上褂，落落大方的走上了锁井镇，锁井镇上人山人海，前拥后挤争看“革命”，他们叫嚷着看革命啊！看革命啊！锁井镇上这段轶事预示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风暴。

俱往矣！而今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学生，胸前挂着毛主席语录，书包上也绣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他们集体朗读主席的教导，这派兴旺景象不正是一次政治、经济、文化深刻得无与伦比的大革命的预兆吗？

8月30日

上午我们战斗小组，讨论写了张大字报“新北大的革命同志努力啊！”

下午去工人体育馆看1966年北京国际乒乓邀请赛半决赛，中国对朝鲜。这是第一次但也将是最后一次看比赛，路太远了，很不方便，以后不准备去看了。晚上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五四广场上灯光照得如同白昼，电影厂的六、七架探照灯来回扫视，主席台上闪光灯不断，五六个记者拼命在那里抢镜头，王任重同志出席了大会，北京市文革主任吴德、副主任陶鲁笏因有会不能来参加，也派了代表来。大会开得很隆重。我估计明天的《人民日报》会大肆宣传的。

8月31日

东语系乔兼武（乔俊礼），杜文革（杜文中）写出了一张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造三个大反”。公然叫嚷“取缔党团组织，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叫嚷党政合一，叫嚣要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当即反驳的大字报贴满了，晚上10点召开全校批判斗争大会，批驳了乔俊礼的反动言行。

大会主流是好的，但是极不民主，压制不同意见，围攻恐吓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学，简单地把乔打成敌人，是十分不慎重的。

因为群众的抗议，大会的调子越唱越低，从初始要乔俊礼低头，到要他坐下，以至还给了他一件衣服穿，显然筹委会对这次会议没有充分研究。

东语系一红卫兵认为乔的大字报是反动的，乔本人不一定是反动的，当即遭围攻，许多人呵斥他，大会的一些主持人还要撕他的红袖章，他当即表示抗议，退出会场。

我看到这里感到很气馁，也说了一句“我也退出会场”离开了我的同学。始后一想，大会主流是好的，批判斗争是及时的，应该的，我又回来了。我觉得刚才的行动，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加以充分的考虑，是错误的，危险的。这反映了我感情深处的东西，对反革命的东西熟视无睹，而对革命的缺点却敏感异常。今后碰到事情千万要冷静，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来分析。

9月2日

于静蕾这个人也不太好接近，不过很可能归根结底是我这个人不好接近，思想的城府如此深严以致令人望而生畏了。今天《光明日报》记者向他们约了一份稿，我没有了解情况，就对他们说：“你们总不给人方便！”这个指责显然没有道理，没有调查研究，她当时变了脸，愤慨地说：你老是给人扣帽子。他批评得很尖锐，我很尴尬。过后一想觉得有理，但一想到“老”字，不免有些悲伤。我难道与于静蕾接触了仅几天，就“老”给她扣一些帽子吗？我应该自责，我的谈吐可能太道貌岸然了，太狂妄了，革命的词、自诩的词太多的挂在口头上了。

入学以来，很多大学同学都有我这样“不好接近”的感觉。我也知道，我曾经希望摆脱这种状态，但是没办法。

我有时觉得很孤独。

我优柔寡断，迂腐，装腔作势，狂妄，好出风头，令人讨厌。我渐渐失去了我应有的质朴，热情，大方，开朗，该诅咒的陆平黑帮把我坑害得多么厉害啊！

于静蕾对我戒心很重，唯恐冒犯了我，这是我谈吐和言行应有的报应。

9月6日

我已经是在隆隆的津浦线列车上继续我的日记了。昨晚我克服了剧烈的动摇与鲍宏，关仁义一起来到了北京车站，在广场中露宿了一夜。今天四点便离开北京了。

關仁义的所作所为搞得我很尴尬，幸好他决定走了，要不会被赶走的。没有我的面子。他在124室一天都呆不住。但他终于招来了一张大字报“關仁义你究竟干什么来了？”

但是他极端无知，一会儿要我找作者辩论，一会儿要撕大字报，如此不识时务，真是世界上罕见。我声色俱厉地警告了他，他才收敛了一些。上海人有很多缺点，我与陈奎宁说：“现在，我觉得与上海人相处有些不习惯了。”陈曰：“我与说上海话的上海人相处感到不习惯。”

9月7日

上午9点到达了镇江，阴雨蒙蒙霏霏，因为想去扬州，不顾鲍宏与關仁义的阻拦，把心一横就下了车。

中午到了镇江农机校，与“东方红”战斗队的一些同志作了交谈，主要是向他们介绍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晚上与“赤卫队”的同志座谈了，向他们提了几点建议。几个“赤卫队”同志的观点也不完全一样。

北京农机，北航一些同学指责赤卫队是保皇派，大方向有问题，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可能赤卫队的观点比较保守一些，革命闯劲还不够，但他们很注意政策，况且他们的观点也是在改变，也是在进步的。他们是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大方向也是基本上对的。“东方红”不应翻他们的老账。

“东方红”的观点比较先进，人也多，不过他们对赤卫队有些专横跋扈，傲气太重，大多数人还认为“赤卫队”是保皇派，显然这不利于团结。台风、暴雨、整整逞了一天的威，去扬州的轮渡不开，我就只好住在农机校了。

9月8日

台风警报解除了，但风依然很大。我看了《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因此认为杭州还是不去的好，去了我一个人也是无用。

上午开到了免费乘车单，是晚上6:49的，因此乘空闲在镇江城走了走，去了金山，在甘露寺认识了镇江造船机械厂的两位工人，与他们交了朋友。他们给我照了相，我们三人还合照了一张相。

金山寺顶上的御笔石碑“江天一栏”，甘露寺的石碑“天下第一江山”都给砸了，其他一些石碑石牌也给砸了不少。这些东西为什么要留下呢？可格砸勿论。

下午去镇江地委看了看，又随便走进镇江师范学校，本来想看一看马上就出来，但想不到一进去就出不来了，被他们围住了。

镇江师范学校的同学老师对我一个普通的北大同学有着难以相信的热情。他们听说有一个北大的同学来了，蜂拥而至，一下子就聚集了快一百个人（他们全校师生不到400人）。我给他们介绍了北大，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我的口才不好，讲得不流利，不怎么生动，可还是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特别是当我讲到毛主席派中央首长来我校的情况时，他们兴奋地鼓掌。我讲完后，他们就要求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真是对我信任极了。当他们知道我6点就要离开镇江时，他们极力挽留我。当我答应今晚不走明天走时，他们又是一阵欢呼雀跃。左右前后有人陪我看大字报，真使我浑身难受惴惴不安。

晚上我又在教工俱乐部与革命师生举行了座谈，有200多人参加，气氛十分热烈。我两次介绍了北京，北大的情况。接着他们又递纸条要求我回答问题，我大约收到了近100张纸条，他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提出来了。

我一方面立场鲜明坚决表态支持革命左派，同时也很谨慎不贸然回答他们有人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防止犯错误，给坏人利用，为镇师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不好的影响。他们越是热烈的欢迎我，信赖我，我一定要更加谦虚谨慎，当群众的小学生，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学习。

如果像北航王长才一样，动辄就是抗议，就是阴谋，对广大革命群众不是循循诱导，而是发号施令，不是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群众，群众就不会吃你那一套，好心就会起坏作用。

事后向一部分同学了解，他们认为通过介绍北京的情况来煽风点火，群众就不知不觉突然不知不觉接受不了，效果比较好。当晚就有同学准备成立战斗组，不接受文革小组的错误领导。晚上我讲完后，他们拼命鼓掌表示感谢。我涨红了脸，连连摇手。我当然有愧，我有什么权利能够接受这么多掌声呢？！光荣一切属于党和毛主席。

我受到了多么大的教育啊！外地无数革命师生，是多么想望北京，想望毛主席啊！他们早也想，晚也想，梦中想，就想着有一天能上北京，能见到毛主席。

而我作为一个北京的大学生，长住在北京，却身在福中不知福，对这点意义了解得很少。我在毛主席身边学习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应该时时刻刻想着这一点，用它来鞭策自己，我应该无愧于作一个万众瞩目的北京的大学生。镇师语文组的同志在下午与同学座谈时给了我一个条子，把它录下来，让我永远记住吧！其他很多条子，全留在镇师了，我手上只是偶尔带走了一个。

北大同志：

我们最最热烈的欢迎您到我校来进行串联，我们已经等了您好几个小时了，我们最真挚、最迫切的欢迎您跟我们谈谈，我们最殷切地要听听来自毛主席身边的战士的声音。敬爱的同志，我们欢迎您，我们等待您。

此致

革命的敬礼

镇师语文组革命同志

9月8日

9月9日

上午8点33分离开镇江去上海

下午3点多到达故乡上海。

8月30、8月31、9月4日部分北京红卫兵与少数上海学生，大闹上海市欢迎外地革命师生大会，两次冲进市委大楼，责问上海市委，搞得上海满城风雨。听说，5日6日两天只要听你说普通话，马上就有人围住你要辩论。的确上海人民是十分热爱上海市委的，我在感情上也是一样，上海市的老工人、先进工人讲了许多肺腑之言，（贴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大字报。这些老工人看到、听到这些不好的事件，个个老泪纵横。要不是他们听党的话，文斗不武斗，早把这些小家伙打了。梁仁达烈士的夫人。杨富珍等革命工人的讲话，我看了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北京红卫兵必须尊重上海人民，必须尊重上海百万产业大军，如果再专横跋扈强加于人，必将脱离上海一千万人民。

下午去华师大，找到了乐俊国。晚9点多回家，正好红卫兵在抄“老板娘”的家。

9月10日

上午在华纺，中午在市委，下午、晚在上海外语学院。

9月11日

上午决定与生物系几个同学一起离开上海去南昌。南昌在危急中、南昌在恐怖中，它请求全国革命师生的支援。下午4:50离沪。

9月12日

上午9:07到达英雄的城市南昌。

下午副省长黄知真讲话后，晚上又是空前的游行。几十辆宣传彩车在街上来回开，妄想造成虚假的和平、欢乐、庆祝的空气，掩盖前几天省委挑动工人斗学生的严重事态。

南昌满城皆是大大字报，大标语，大口号，南昌的学生狂热地呼喊“炮轰司令部，火烧省市委”洪都机械厂工人等也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这一口号，一般工农目前表示沉默，只是表示支持省委黄知真讲话。我看江西省委有鬼。

9月13日

黄知真讲话后，大专学生又是一片反对声。“黄知真揪定了”，“等着吧！黄知真等我们从北京回来后算总账”，“黄知真，我们把你镇压学生运动的功绩上北京去向党中央报告”。市内工人，干部，农民开始支持学生。而一些支持黄知真讲话的游行队伍尽管声势浩大、色彩缤纷，持续不断、却没有战斗力量。我看黄知真再不真正检讨就危险了。上午参观了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八一纪念馆。南昌不愧为英雄城，江西不愧是真正老革命根据地，这块土地上遍地都洒满了烈士的鲜血。

纪念馆收集了全省20多万烈士的名册，祭堂正有主席献的花圈，“邵式平同志千古，毛泽东敬輓”。

我觉得我该写封信给上海市委，建议上海市委也做好革命文物，纪念地点等工作。上海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

外地的高校师生几乎都跑完了，或去首都，或去全国，江西大学只有40余同学。再说我个人行动困难，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出身不好，人家不欢迎。看来还是回校革命比较好！想与其他北大同学合伙搞革命，他们知道我的出身后也退却了。我不想去使他们为难，晚10时乘车离开南昌去长沙。

9月14日

上午到达长沙，步行去湖南大学，在湘江边上休息了一会，一时兴起，到湘水中游了五分钟泳，“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能够在毛主席游泳过的地方游泳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湖南大学就在岳麓山上，学校没有校门，任人进出，故岳麓山公园与湖大就混为一体了。

湖大目前主要是在揭省市委的问题，有些人对王延春（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问题揪住不放，对张平化也咄咄逼人，这不是正确的态度。

傍晚登岳麓山顶，对联“古松拔地五千年，长翼垂地八万尺”把岳麓山苍松翠柏树木扶疏及山鹰盘旋，冲击长空的寥廓雄伟的景象贴切地描写出来了。山上埋葬了几十位旧民主革命的烈士如黄兴，蔡锷等。张辉耀的墓也在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毁了。

湖大礼堂的背后不远就是著名的“爱晚亭”，回忆起主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我无限惭愧，我难道只能做政治的庸人吗？

晚上抄了谢富治副总理的一封家书，非常好！

9月15日

离开长沙去武汉，车太挤了在武汉停了一天，一方面看看，一方面休息一下。下午三点到达武汉，傍晚参观了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武汉水利水力学院。在武汉的二千名外地师生，主要是北京师生，建立了南下北上串联总部，其观点明显和武汉的师生，工农观点不一样。一个要打倒张体学，一个说张体学跟毛主席跟得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北京的师生在武汉显得不受欢迎。

9月16日

中午离开武汉前，参观了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我望着这滚滚长江，我是多么想跳下去搏风击浪呵！可是我害怕风浪，我十分鄙视，厌恶肖涧秋之类的人物，但我自己却是一个十足的肖涧秋，可悲极了！

9月17日

中午回到北大，年级里正在开展小整风。大家对我这次出外串联显得有些不满。收到了魏兴全给我的来信。

9月19日

文化大革命深深的触及了我的灵魂，我的思想紊乱不安，在剧烈动荡中。我觉得到了这种时刻不在这场风暴中死亡，就在这场风暴中得到新生。尽管我目前包袱重重，个人患得患失，与红卫兵革命小将有天壤之别，但我不甘“死亡”，我将永远战斗，永远革命，我是死也不甘沦为政治庸人的。

这几天时间安排的极紧，想去看看来京的上海同学都没有空。

这几天一些同学对我的这次出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尖锐的责问。我过去是陆平时期的红人，只听甜言蜜语，只听好话，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真正的批评。现在有人批评我了，好得很，我应该高兴。

我这次出走曾经历了十几天剧烈的斗争的。我犹豫、动摇，一天之内经历几次反复。

我想走，我觉得北大目前平淡无奇没有斗争，没有事可干。每天读毛选，读马恩列斯吧！我坐不下去，我觉得这样干有愧于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若干年后，当有人向我，在那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在文化革命的一个中心北大，你干了些什么？我难道能说：我在图书馆里读完了恩格斯的…，马克思的…。这一切难道不酷似于三十年代的吴晗吗？在图书馆中躲过了轰轰烈烈的斗争风暴。但是我又不敢走，班里的同学都没有决心走，我一个人走呢？太不方便了，自己出身不好，能走得出去吗？班里会同意吗？我走后，同学将会如此反应呢？“怕”字重重，笼罩了我的头脑。但是我实在不甘沉默，不敢死亡，不甘做政治

庸人。我想既然我有资格参加四清，那我也一样有权出去串连，至于黑七类子弟禁止外出的说法，不一定要遵守。至于有人反对，非议，那是肯定的。但外出串连的人，哪一个不是顶着风走的呢？我应该迎接斗争的风暴，不能躲在蜗牛壳里，我毅然决然地走了！尽管在火车上我还是忐忑不安，但我终于离开了北京。

现在看来这一切的考虑，都是以个人出发的，我的确没有想到北大的运动会怎样，选举会不会垮台，如果垮台影响又将如何？这一切我却一概没有考虑，我没有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

9月20日

化学系请到了门头沟煤矿老工人，白宝纯做忆苦思甜报告，尽管他的报告我听过一遍，但这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听，觉得教育特别深。在旧社会里白大爷受尽了各种各样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摧残，因此他对牛鬼蛇神最恨，恨得咬牙切齿。当他讲到在北大文革展览会上，看到一些臭知识分子还藏着日本旗、美国旗时，他愤怒到了极点，他恨不得把这些牛鬼蛇神砸个稀巴烂。可我呢？当我看到这些时，有强烈的反响和愤怒没有？没有，我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

今天晚上的斗争大会，主要揭发了陆平打击迫害工农同学，包庇反动学生和坏人的罪恶事实。我对党的阶级路线是拥护的，但是不是毫无保留，真心实意的拥护呢？特别是对红五类子弟采取的一些行动和言论是否真正的予以支持呢？

我往往没有看主流，总觉得有些同学有些偏颇了！

下午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希尔主席及夫人来我校参观访问，赵毅敏陪同，受到了我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9月21日

在上午的班级整风会议上，武礼津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就出外串联，没有清除西方文学的影响，以不好的方式搞了两本书，谈话时马列主义、辩证法一套套的等事项提出了意见。晚上系里开了斗争陆元杓，程民德大会，较好。中午张继阳来我处。

9月22日

晚上又召开了斗争黑帮分子 陆平、彭佩云大会，在会上各系革命师生员工愤怒的控诉了陆平、彭佩云黑帮集团，打击迫害工农学生，调干学生、革命左派、包庇坏人的滔天罪恶，大会开得十分成功。会场革命师生，始终处在极端愤怒中。台上的几个黑帮分子吓得瑟瑟发抖，群众的感情，群众的愤怒，群众的意志是多么伟大的力量啊！会开后，同学高兴地说，这样斗下去，准能把陆平黑帮斗跨。因为群众烈火一样的愤怒，大会斗争时让杀人犯孙宗鲁跪了一会儿。在群众的愤怒狂飙前，把陆平、彭佩云黑帮吓得垂着手低着头，弯着腰，一个大气都不敢出。在大会进行时，我也怒不可遏，每一句口号都出自心间，打倒陆平黑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9月23日

今天班里继续整风，我也发了言。

我觉得入北大四年来，自己好像思想改造、思想斗争也抓得很紧，但基本上回避了主要的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主要矛盾。而对彭真、陆平、那一套很感兴趣，譬如反对中游思想，反对“三过”^①，自己的确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的结果往往不是无产阶级化、革命化，反而修正主义的观点更加牢固了。

这次出外串联实质上也是以这条线为纲的。武恪钦发言，说他过去很羡慕我，以我为榜样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看来我确实是当了一回修正主义的黑榜样，不仅在学习方面，而且在政治上。

晚上在北大周围试放焰火，今年的焰火有很多瑰丽无比的新品种。

同学张继阳来访。

9月26日

晚上庄家富同志来我校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

胡平及其同学来访。

^① “三过”是“政治上过得去，专业上过的硬，生活上过得好。”的简写。是一九六四年北大学生思想教育运动中批评的靶子。

9月28日

志华来看我，他是27日出去串连回来的。

在35天内他跑了西安、成都、重庆、贵阳、桂林、广州、长沙、武汉、上海、杭州、济南11个城市，经了大世面，见了大风雨，收获很大。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嗟呼哀哉！

9月29日

中秋节，竟然没有一些过节气氛，很自然。

9月30日

国庆前夕，首都一片节日气氛。

下午我去昆明湖游泳再次横渡，创游泳最迟日期记录。而最早日期的记录是去年5月14日。

10月1日

今年的国庆游行一片红，人手一份主席语录，汇成了红色的巨流，流过了天安门广场，晚上北大联欢。

10月2日

晚上看电影，《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和《毛主席第二，三次会见革命小将》。我们伟大的领袖真是和亿万人民心连心啊！

10月3日

到阳泉公社白家峒大队去劳动。

10月6日

晚上我们接到了消息听说，北大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搬开聂元梓，全校轰动。当时同学们都议论纷纷，认为这是件大事情。我当时表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贴了大字报而已，闹不大，但心里还是不敢断定形势将会怎么发展。

10月7日

早晨文光理，潘世俊去学校观看形势，中午回来带回一叠大字报，一时大哗，同学们纷纷打背包，嚷着要造反回去。潘世俊大力支持，向世明一时拦不住，眼睁睁的看着都走了。只留下我，胡克定、向世明三人未走。当时心里十分乱，左右犹豫，前后思忖，难下决策。我还背着行李在公路上走了两站路，最后却又转回来了，优柔寡断到了绝顶，呜呼，难道真像胡克定说的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晚上总算回来了，真是没有出息！学校里情况有些变化，革命真是不容易啊！北大的运动经过了多少曲折。



（上图：1968年春，北京香山公园，新北大公社总部的一批朋友。）

10月12日

好久没记日记了。

上午开讨论会，火药味很浓，差一点与文光理崩了。他是个能人，很有些斗争策略。不过我还是不怎同意他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世界观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首先是思想、是原则然后才是方法策略。要牢记毛主席

的教导，办事要大方一点，手臂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Q主义，实际上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

10月13日

今天忙了一天，反复思考终于写成了大字报“两种方针，两个前途-学习林彪最近关于学习毛著指示的体会和心得”，我认为我的大字报是深刻的，可反应却十分冷淡。

10月14日

力四流体解散了，无事干，今天读了一天列宁的书（哲学著作）把我的脑子都涨大了。

10月16日

下午会见李玉胜，顾志华要走了，我们班的同学也要走了，心里很乱，又想走了，上次回来的太快了，失算！我努力争取再出去串联。

10月17日

经过一天的奔波到晚上我与卫益俊搞到了5张票，两张去济南的，三张去郑州，但苦于系里不肯开介绍信，车票的全程又很短，因此，一时难于决定是否离开。但一想到外面的天地广阔得很，因此就走了。

晚上混上了5次特快（国际联运列车），36小时到达了桂林。路上检票一次，被列车长发现了，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后果，只不过解释一下，听了几句话而已。但心里总觉得不快，理亏，缺乏正义感，这种不快感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天。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天只不过窥其一斑。登上了广西师院内的独秀峰和车站附近的南溪山，深感桂林山水之奇秘，诡异，千变万化，大自然的魔力震撼人心。桂林山水这样千奇百怪，科学的原因是科斯特。

10月20日

桂林市在一场大风暴后显得很平静，我们带来的“林彪讲话”受到很大欢迎。

10月23日

22日中午乘665次列车离开桂林去贵阳，下午到达贵阳，云贵高原的名城。

晚上在邮电综合大楼广场召开大会“贵州日报第一次检查批评大会”。贵阳市中心中华路一带人山人海，炮轰派，保卫派在那儿狂呼口号，情绪十分热烈。看来贵阳六十万市民都卷进这次大漩涡中去了。

10月24日

上午去贵阳医学院。路上与一工人谈话，他对贵阳市委镇压学生镇压群众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听说贵阳有许多工厂私设监牢，关押有不同观点的人。

贵州的革命左派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如今贵阳市人民得到了大发动。晚上盲童学校的盲童左右相连，前后搀扶也上街游行。举着红旗，主席像，拿着盲文的毛主席著作，高呼“火烧省市委，炮轰西南局”，两旁路人看了莫不为之感动。工人，家属，妇女，那些“炮轰派”，那些“狂民徒”，背着孩子，抱着孩子，狂呼“省市委有问题，大方向错误的”。历史上有这样的革命吗？不用革命两个字能解释这些狂热吗？这就是人生之所以如此壮丽的秘诀！真谛！

10月25日

早上离开贵阳，本来想在遵义下，但因车挤，只好作罢，过遵义而不入想怕会是终生的遗憾了。

10月28日

到重庆已经两天了，昼夜忙于搞车票、船票无暇他顾，至今日方得喘息。

重庆是个山城，市政建设别具特色，长江与嘉陵江在市中心汇合，景色十分壮丽。今天参观了“中美合作所”，红岩村，虽然搞得精疲力尽，但收获十分大。实地参观比读书要深刻得多了。

10月29日

上午在重大与遵义卫生学校的两位同学座谈了。鼓励他们回学校大胆造反，不怕打击，不怕扣帽子，不怕挨打，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

重大“八一五”过去是左派，但今后是否永远是左派呢？我将拭目以待。

10月30日

今天重庆和首都七个革命群众组织召开的彻底揭发批判重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重庆市中心大田湾体育场隆重召开。成千上万革命师生参加了大会，清早革命师生就从四面八方唱着歌呼着口号向体育场集中，市内交通阻塞。大会11点正式开始，直到晚上6点结束，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大中小学生高呼“坚决要求改组重庆市委”，“八一五好得很”等口号，群情激昂。路旁挤满了围看的群众，一些老年人露出茫然莫解的神色，显然他们不能理解这一大革命。

重庆后字242部队六同志贴出了揭发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大字报“警备司令部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帮凶”，“警备司令部的政委好凶啊！”影响很大。

10月31日

今天搞到了船票，十分高兴。重庆的几天将是惨淡经营，“凄风苦雨”，十分贫寒的生活，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金钱。

11月1日

今天去重庆南温泉洗澡，游泳。室内的一个游泳池水较热，室外的一个刚够个温字。据重大一位同学讲：重庆三泉，南泉最小，温度也很低；西泉最热，相距约两百多里地，过去为宋美龄、宋庆龄两姐妹霸占，现在人人可去了；北泉较大，温度也比南泉高，风景特好。其实南泉附近风景也不错，仙女幽岩，悬崖飞泉，九级“瀑布”等听说共有12景。重庆的同学说：“北碚是重庆的风景区，西南师院在北碚，我到过上海、北京、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大学，全国约要数这个学院风景最好了！”明天一早就要走了，要不，去一次北碚，还是很不错的。

11月2日

早上七点登上了“驳8-157”船，9点半了驳船与东风八号帮在一起就起航了，船上人很挤，设备也比较差，生活有些困难。但在长江行船，站在甲板上，极目楚天舒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岸景色变幻无常，江风挟带着浪沫化作的水汽迎面吹来，十分凉爽，沁人肺腑，也足以慰藉了。风景，世界上的景色有两种。一种是“假的风景”，实际上充其量只能算盆景，例苏州的园林，北京的颐和园，上海的豫园诸如此类。还有一种是真正的风景，大王之风浩荡而来，万里长城绵延曲折、回转起伏，穿越了北中国的崇山峻岭；浩浩长江奔腾向东，水天一色，茫茫无边；登泰山而小天下，看清晨东海波涛托出灿烂夺目的红日，如此等等。我酷爱“风景”，这才显示祖国母亲真正的面貌和性格。江山如此多娇，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每当我面临如此大好江山时，胸中豪情顿时百丈，浑身充满了战斗的力量、生活的勇气。而那些精雕细琢的“盆景”，虽然有时也引我留恋，但是使人优闲、消磨人的斗志，绝不能激起心灵的狂飙。

我想长江三峡也是大王风，浩荡荡的风景吧！我期待着三峡。

11月3日

昨晚在万县市船泊了三个小时。我也上岸一游，码头上挤满了人，简陋的乐队慢吞吞的奏着乐，欢迎赴京归来的革命师生。万县有15万人口，很热闹，码头旁几家饮食店通宵营业，人来人往，生意兴隆。万县的东西很相宜，只是余财源枯竭，唯能望货兴叹了。

清晨三点从万县驶出，早晨7点半到奉节古城，过白帝城就到了瞿塘峡了。瞿塘峡最为陡峭，巫峡长而崎岖，西陵峡断断续续就无甚特色了。在三峡行船像在深谷平湖驶船，上是阴沉沉的天，下是奔腾咆哮的急流，前后左右皆是高山峭壁，环顾四处茫茫然，俨然与世隔绝了。往前看山重水复不知滚滚长江何处去，往后看峰回路转不知滚滚长江何处来。回忆起长江入海那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壮阔，雍容落落大方。而三峡的长江却受尽了委屈，如此狭窄，暴跳如雷，水回浪复，卷着无数的漩涡，才挣扎着挤出峡谷。同是一条长江竟有如此变化！我竟然有些受不了。

我期待着变化，我要争取变化，我也要像长江一样，从祖国大地母亲的躯体上吸取营养，不断充实自己。那管前面有多少高山峻岭，我也要冲出去，挤过去。哪管前面有多少曲折反复，我也要前进、要向海洋，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扬子江奔泻入海的气魄。才能这样广阔，这样深厚、这样雄壮，这样从容，这样席卷一切。才能以自己的血液来滋润祖国大地，我的名字就是扬子浪，我是何等的热爱长江、羡慕长江啊！

下午三点钟到宜昌，即出三峡，从此长江就流入平原了，茫茫无际。到宜昌走了648公里，还有722公里，一半路都没有走到。

李白有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也太浪漫了，白帝山又矮又小，无甚彩云，从白帝至江陵也算得千里，但我行一日尚未到，李白那箇轻舟就能一日回家了吗？两岸猿猴一声未啼，东风八号缓缓而行，哪会有“猿啼一声船过万山”的景象呢？李白也太悠闲了，太无聊了。

晚上八点半到枝城，荆江（长江的一段）大桥正在日夜修建，江上灯火辉煌船舶繁多，工程进行得很紧张。将来的川汉线就要通过这里。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我国加速进行！

11月5日

昨晚11点余到达汉口。

11月6日

卫益俊病倒了，身体不好，情绪也坏。看来我根本不关心同志，我们处的不好，再加上他病了，我做了些密切关心的尝试都不受欢迎，我心里十分不安。今天去东湖看了一下，东湖是绿色的，一切皆绿，青山绿水，蓝色的琉璃瓦，碧绿的芳草，苍绿的松柏，只是梧桐树由绿变黄了。秋天来临了！

11月8日

今天我也病倒了，咽喉充血，扁桃腺发炎。亏得医生帮忙，我们才搞到一张10号的票，听说车挤极了，各种流言让人目瞪口呆。

11月10日

这几天干了许多糊涂事，9日晚12时卫益俊发了一封电报，原文是“急病于汉口十九女中请汇款，恕罪俊加”。在电文纸上加了“请勿删改”四个字，在发电时营业员修改，我允许改成“急病需款请电汇至武汉19女中转北大恕罪俊加”，当晚还给班里同学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卫益俊病情和我们在武汉的困难处境，请求帮助（汇助学金，介绍信）。第二天卫得知此事后震怒，破口大骂改电报的营业员懂个鸡巴！他病了，我应该原谅他，再说我改他电报本来就无理。但是我太狭隘了，我当时想不开满肚子不高兴。就一个人装着一脑袋苦闷出来散步，路过红汉路邮电支局，灵机一动，突然进去打了一个电报给力四流体班，电文是“我9日来信作废‘请勿拆’”出来时才觉轻松一些。同天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请求电汇。我二十年未打电报，两天之内却打了三个电报，也算一件奇事，卫对我的作为颇有些不满，说我的思想方法不可理解。这几天卫高烧39度。

11月12日

今天接到家里寄来的钱，二十块。

11月13日

今天进了汉口车站，想去广州，但人多极了，经过汉口开往北京，广州的车一概挤满了人，我好不容易跳窗上了去北京的车，但后来知“挤”而下了，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挤的车了，铁路线上秩序很乱。

11月15日

我发现我的思想极不稳定，特别在关键时刻经常左右不决，踌躇犹豫，缺乏果断精神，却经常不断的后悔。我常常庸俗地害怕麻烦人家，害怕干扰人家，害怕造成别人的不快与不安，更谈不上必要时给一些人以打击和损害了，我缺乏战斗精神，怕这怕那谨小慎微，怎么能成为战士呢？我应该重新回忆与分析“无毒

不丈夫”这句话，在新的意义上理解它。我应不怕孤立，不怕围攻，走战斗的道路。至于对一些人的议论纷纷，白眼，不快的谈话更应该付之一笑了。我一定要政治挂帅，把我的精神境界推向更高的阶段，更加政治化，战斗化。

11月17日

整天为船票奔走，终于搞到了今晚18点的票，今晨卫去武汉车站上车，从此我俩就分道扬镳了。

11月18日

船上结识了很多新同学，都相当有意思，船上的生活充满了诗意。早晨太阳从船前方升起，金色的阳光在船左首铺下一条光芒灿烂的大道，通向水天相接的远方。轮船激起的波浪，把近旁的木船颠得七上八下，惹得船上的乘客担惊的叫唤着。船尾四五只鱼鹰来回盘旋，一会儿踩着水面飞行，一会儿却傍着桅杆滑过，宽宽的翅膀缓缓地拍动着，来回寻觅着从船上抛下的剩菜残渣。江风吹来，把船舷挡风的帆布吹得啪啪作响，人们依着栏杆三三两两的谈话，或独自眺望着在地平线处依稀可见的两岸景色。风拂动衣角，扬起头发也叩击着人们的心弦。大江东流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浪淘沙兮风飘絮…，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长江啊！你负着千万大小船只，灌溉着几百万亩的沃野，推动着巨大的水轮机，可你又寄托着多少有志之士的豪迈理想，多少长存天地与日月同昭的感情，且也溶解了多少无味的叹息，和日夜情人间低低的私语。

扬子，扬子！你难道不是一条思想的长河吗？你难道不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吗？对着长江我百看不厌，百思不解，长江，我真想用你的急浪来沐浴我的躯体，洗涤我的思想。会有一天，终会有一天，我会有机会跳进涛涛长江，去弄潮击浪。会有一天的，会有这一天我将在历史的长河上激起浪花！

11月19日

昨晚晚11点到南京，听南京上来的同学说18日上午张贴了国务院决定，11月21日暂停串联，明年四月一日，春暖花开之日再行串联。

11月20日

昨晚到了上海，大上海依旧是那样喧腾，嘈杂。

11月22日

去师大，得知聂元梓同志已到了上海来进行革命串联，上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相当顽固的。20日见了企成一面，他很矜持，苟于言笑，心情好像不怎么开朗了。

11月23日

拉稀，无奈只好在家休息。

读魏钢焰的《灯海曲》，联想起串联途中的生活颇有同感，抄诗几首于下：

草叶上的诗

如果你拆开我寄来的诗稿，
却只看见一片绿色的草叶
别惊讶吧，朋友，
它 ，就是我的诗！
青海湖呵，
层层白浪滚卷，
似千百匹烈马，
振摇着白色的长鬃，
奔扑而来。
从昆仑山巅飞来刚劲的风，
他巨大的翅膀拍打湖面，
青海湖昂头高吼，
怒浪四溅！
呵，青海湖！
谁知道你深深的湖底，
蕴藏着多少语言？

那翻腾不息的浪花呵，
可是你灵魂的波澜？
从你层层白浪上，
我看见五千年古国的历史，
一页页飞快翻过，
我知道呵，在你猛烈起伏的胸膛下，
是我们民族的心跃动！
你推起层层波浪—
羊群奔跑在草原；
你用手撩拨海水—
晶莹的盐粒闪闪；
你敞开宽阔的胸膛—
柴达木的油海一片。
你向我哟，
喷发出芳香的气息：
醉人的油香，
鲜冽的海盐香，
浓郁的草原香…
从岸边我摘下一片草叶，
久久地浸在你的胸里，
我相信他能把这一切
都渗入它的脉络！
呵，朋友
你从这小小的草叶上，
怎会看不到我的诗歌？

写水写得多好啊！

长江
这是长江？
水色苍苍，

烟雨茫茫…
我梦中的你啊，
可不是这个扮相！
绿得心醉，
清得眼亮；
望你一眼嘛，
连石头也要歌唱！
这是长江！
烟雨茫茫，
水色苍苍，
你
正该是这个模样！
你饮过战马呵，
磨过刀枪；
你怎能头戴翡翠，
满身异香！
呵，长江！
我在你身上，
也闻到黄河的土气！

11月25日

一天之内翻完《金陵春梦》第一、二部，获得大量历史资料，历史知识，得益匪浅。但作者“唐人”毫无马列主义常识，漠然无视阶级斗争，津津有味地大写私人生活，大写国民党内饿狗与饱狗，大狗与小狗之间的斗争。作者的立场是国民党内野派，地方势力的立场、观点。

聂元梓二十一日到上海，二十二日在文化广场大会讲话，表示要彻底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她讲话的不够策略表示遗憾，但是我相信某些人高叫着要打倒聂元梓，这是保守派以攻为守的策略罢了。

在交大看到“毛主席诗词十八首（未发表）”，心存疑团，未敢抄。

一九六六年

11月28日

回到北京，北京啊！我心中最神圣、最可亲、最怀念的地方。你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丽，比任何城市都来得壮丽。

12月1日

成都大学一位女同学来访，长谈两个多小时，像所有的四川人一样她十分健谈，相当泼辣，没有丝毫扭捏之态，谈吐相当直爽，只是像通常的红卫兵领导人一样，她略微有些狂妄，但这种狂妄也不怎样令人不快。

12月3日

今天在大馆借到了《西行漫记》，欣喜若狂，整整看了一天，连通常的下午锻炼都没进行。

我回来还是早了，要在杭州、无锡、南京，稍作停留，一定美妙多了；甚至徐州也可以下来看看淮海战役纪念碑，曲阜去看孔庙，泰安登泰山。

12月5日

今天在西山作了一次试探性步行。早上乘了33路车到香山，从香山走到卧佛寺往西至樱桃沟，进寿安山，沟内泉水淙淙，沿沟而上，发现源来自一石下，源旁有一峰名白鹿峰。

从樱桃沟出来，已经十点半了，沿着西北山麓的公路往南走，整整三个半小时，走到了八大处。八大处内八个寺院的菩萨已经一概搬走了，只留下八座空空的院落。我与几个小朋友兴致勃勃登上了八大处后的虎头山顶，在山峰上俯瞰了石景山区的雄伟景象。虎头山比“鬼见愁”矮，但两座山峰却一样险峻，严格来说虎头山比“鬼见愁”更要让人发愁。

下午四点许下山回家，在行人稀少公路上整整走到七点才到黄庄。这时我实在忍耐不了啦，下午一二点时脚就扭了，现在两个大腿都又酸又疼，如果停下来休息的话，一定早就不能走了。在井板村上了34路，白石桥下，换32路，两个

车站间一百来步路却也费了我好大的劲。今天我的确使我的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疲劳程度，步行串联谈何容易。

12月7日

昨天下午乘车到温泉游览，温泉黑山石旁高立着一座纪念塔，是民国二十五年有名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立的辛亥滦洲革命烈士纪念塔。塔旁就是有名的黑石，上书“在云流水”，以及各种地质院校，系级留下的讳甫。不过最有意思就要数1933年一个东北人的石刻了。巍然八个大字：“国破家亡，何寿有之”，小字：“九一八二周年避寿于此”。

思潮如涌，把我带到了三十几年前：北京的一个年轻的东北籍大学生骑着毛驴来到了温泉，登上此山头，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想到东北沦陷，骨肉分离，眼前的华北平原，西山雄脉又朝不保夕。天色阴沉山风紧疾，枯枝朽木在寒风中瑟瑟作响；青年悲愤欲绝，握椎挥锤打下了这八个大字，同时也把它铭刻在心头。呜呼，何寿有之，我那降生的茅屋也许给日军焚烧了，我那亲生的母亲也许给日寇虐杀了，我那嫡亲的胞姐也许给日寇奸污了，国要破，家要亡，我何寿有之！

我深深钦佩这无名的热血青年。沿着公路离开温泉再走十余里路就到了大觉寺，这曾经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庙宇，而现在却彻底破落了，但建筑依旧，为北京林业机械设计所所用。寺内的玉兰花（春天开）和七叶树是罕见的，听说郭沫若也来赏过玉兰，十分遗憾，几乎在所有的游览胜地我都要碰上这位“浪子”。

大觉寺南面还有一莲花寺，但天色已晚只得止步。大觉寺后面有一小山峰，虽严冬已至，但上面依然苍松翠柏，显得十分秀丽，因为像一个亭亭玉立的青鹭，故名鹭峰。鹭峰之后横着一条大山脉，在晚霞夕照之中，可依稀看到一座宝塔，传说当年杨六郎兵败被困于此，手下只三四骑，晚上六郎虚设红灯，几骑人马提着灯回绕着塔转悠，使得辽兵不知虚实，当晚不敢轻举妄动。次日晨援兵至，杨郎得救，故此塔名六郎塔。塔下有一泉水，相传是六郎战马所刨，故名“马刨泉”。

这些传说都是一位北京的中学生给我讲的，我与他一同等车，他就给我讲，指着46路路牌上的站名一个一个讲了。

传说韩家川是辽时名将韩昌驻地，而亮甲店则是杨家将亮甲之处，东北旺，西北旺是余太君想六郎心切东北望西北望故命之。黑龙潭风景秀丽，一潭池水黑红黑红。自然这些传说都不过是传说而已，但却为西山景色增添了风采。

今天去参观卢沟桥，从广安门乘39路车过丰台路口不久就到了卢沟桥。桥长一百来米，宽不过六七米，已经相当陈旧了，单凭桥头乾隆御笔“卢沟晓月”和这石桥本身已实在无甚趣味了，桥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与伟大的抗日战争而联系。从桥上望去，永定河几乎都干了，河滩上摆满了小石头堆成的口号，“毛主席万岁”，“革命万岁”，“长征万岁”，“抗日英雄永垂不朽”。一队队进北京和离开北京的长征红卫兵战士路过卢沟桥，他们抄写着石碑上关于抗日的记载，抚摸着桥上的石狮，读着书写在大桥石栏上的标语“打到美帝国主义”。历史和现实，在此地如此融洽，融合于一个统一的民族精神，统一的反帝精神，一个伟大的革命人民的灵魂毛泽东思想。

12月9日

参加了学校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猖狂反扑，林院李洪山带头向中央文革猖狂进攻。他们攻击陈伯达，江青、康生、戚本禹、关峰；农大附中伊林、滌西也发表了致“林彪”，攻击林副统帅。全北京市都出现了诸如此类的大字报，大字标语，甚至天安门前都贴出了“把毛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人揪出来”的标语，隐射林副统帅。这股风十分强硬，看来关于中央文革的大辩论势不可免。最近北京又出现了许多“黑组织”，乱打乱砸，武斗十分严重。

12月9日：写大字报“李洪山与井冈山”

12月10日：写大字报“在野的在野派的不平”

12月13日：写“‘井冈山’休欺人太甚”

因为写了几张大字报，挨了不少臭骂，同时也得到了不少支持。既然露了锋芒，那就必然招来仇恨与赞扬。激烈的战斗进一步把我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去，这与袖手旁观完全是另一种滋味。

我应该举笔为枪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去，彻底丢掉“怕”字。怕什么犯错误，怕什么旁人的耻笑，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失掉的只是自己一切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风格，旧品德，而得到的却是大锻炼，大提高。

在战斗中，我发誓要无畏地前进！

12月16日

正式参加了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并贴出大字报“造反派与造反派的平方”。在战斗中，自然要紧张得多了，但充满了战斗的欢乐。晚上通宵战斗。



(上图：1968年春，北大校园内，作者与新北大公社内志趣，性情，观点相近的几个朋友合影。左起：马云龙、王复兴、谢定国、任瑚琏、索世辉、张绍清。)

12月19日

我们兵团对井冈山的“红老虎”、“毛林陈之兵”，对红联军的“虎山行”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并且缴获了乔兼武的又一份反革命内部传单“谈至林彪公开信的大字报”，于18日晚7时兵团伏虎团将他扣押，19日凌晨2时半扭送公安局。

“井冈山”，“红联军”等反叛不择手段，终于走上了炮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犯罪道路。

这几天又写出了：

“彻底批判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批判提纲’”

“浪先生不祥的预言被证实了”

“周培源先生和收集炮弹的‘造反派’”

皆以红旗兵团“横扫千军”名义发表。我不善于写正面论述的文章，写出来也气魄不大。我却能写小品，善于揭露，分析。这几天每晚写大字报至深夜2、3点，平时每天睡四、五小时。奋斗其乐无穷。

12月24日

几天以来，乔兼武，杨炳章，张芝，杨勋先后被公安部扣捕，红色造反台被封，“井冈山”、“红联军”总部被封，北大的伪“造反派”已经全线崩溃。尽管“保皇”被搞得很臭，但北大的“保皇派”却大胜了。我因为写了一张大字报“井冈山与李洪山”，震动了井冈山总部，招来了一场围攻，“扬子浪”“浪先生”的名字也传遍全校了。

起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

我所属的红旗兵团“横扫千军”战斗队，直属总部。受总部委托起草各种声明、通告、评论员、观察家文章、大会发言，并接受命令专门撰写各种针对性的大字报。

战斗队里的几个同志，虽然只有相识十余天，但印像却十分深刻，他们都非常富于特征。徐云辉，物三女生，四川人，并不泼辣，也不善言辞，平易近人，谈起话来，娓娓动听，显出十分善良的样子。她经常兴趣盎然，羡慕地听别人谈话，在这一点上她与于静蕾是十分酷似的。王复兴，史一，北京人，校田径队员，野兽性很足，有些愣，爱好吵架与动手，自尊心强，也是一个思想深刻兴趣广泛的人。黄虹坚，文一的女生，广东人，绰号小广东，但讲得一口十分洪亮、泼辣的北京话，是我们兵团的职业演说家，优秀评论员。一天到晚无忧无虑、蹦蹦跳跳的，对所有的人都毫不客气，有时甚至有些嚣张跋扈，是一个十足的活跃人物。她所有的感情面，最多的是鄙视的感情，几乎都在脸上显露无遗了。甘斗，哲五学生，十足的书呆子，一天到晚趴在桌上写文章，十分顶真，是一个老实人，经常受恶作剧的小广东欺负。所有的人都称我为扬子浪，或者浪先生。

关于黄虹坚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24日晚上十点，黄虹坚兴冲冲地跑到35楼去敲徐云辉的门。硬把徐云辉从床上拉起来，“快去找魏秀芬去问他要录音带”，她俩到了哲学楼，魏秀芬不在，就回出来了。但刚出哲学楼的门，黄突然晕倒了，吓得徐云辉马上把她扶到医院，在医院里又给打了一针，黄还嘻嘻哈哈与医生护士又打又闹。从医院出来夜已深了，黄、徐还有一个女同学三人走到了27斋门口，黄突然不省人事的昏倒了，而且再也不醒了。无奈徐与另一个女同学一人扛头，一人扛脚，把这个沉甸甸的小广东抬回了27斋，当晚就送进了医院。据大夫说没有什么病，只不过经常不吃不睡地累倒了吧！

12月26日

今天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诞生73周年，我和全国革命师生，革命人民一起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领袖。全世界和他同时代的所谓伟大人物与他相比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侏儒，是他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是他英明地解答了现实的问号，为全世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是一个使太阳都黯然失色的人物，一个握着历史缰绳的高超骑手。学习毛泽东，跟着毛泽东，仿效毛泽东去创造自己红色的历史。

大风大浪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来的，跟着毛泽东，在大风大浪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誓死也要把历史推向前进。

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大发动，天塌不下来，地陷不下去，任凭世界上出现什么风景，什么灾难，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照样前进，革命照样发展。

一九六七年

1月1日

难忘的1966年过去了，更加伟大的1967年到来了，1967年革命的风暴将吹得更加猛烈，大动荡，大搏斗将进一步发展，整个旧世界都将受到最猛烈的冲击。谁能预料67年会发生什么呢？历史的趋向尽管谁也不能改变，但迂回和曲

折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务必提高警惕，以最敏感的政治警惕性去迎接这场伟大的斗争。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一定要更加无所畏惧的前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在政治斗争、革命造反的伟大气势上狠下功夫。在新的一年里我还要更严格的要求自己，既不作形行浪迹，不拘小节，任意放纵自己的纨绔子弟；也不做谨小慎微，前怕狼，后畏虎的凡夫俗子。要以毛主席为榜样，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时以百倍的努力磨练自己的革命意志，开拓自己的广阔胸怀，提高自己的斗争精神。同时还要努力克服学生气，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学习鲁迅“咬筋”和“韧”的精神，彻底消灭一切颓废、苦闷、无所作为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永远奋斗、永远进步。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积极走向社会，走向工农、走向革命。我应该踏上长征的路途，我应该下矿井，去工厂到工农中去吸收最丰富，最深刻的营养，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我的口号是“滚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污，染一身血迹”坚定地沿着毛泽东为青年开辟的道路前进。

在新的一年里，我还要坚持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努力锻炼身体，准备承受战争与革命的考验。我要跑步，打球、游泳、登山、远足、游览，培养健康的业余兴趣，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让资产阶级名利欲念去见他妈的鬼吧！我健康的精神与体魄决不容许你肆意毒害。我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提高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学习调查研究，学习各种社会科学。我要进一步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还要学习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现代史。同时还要抽空看外文，不让学业半途而废。还应翻阅各种书籍，对资产阶级思想调查研究准备反戈一击。

我还要广交益友，从周围的革命同志中吸收营养，到战斗的集体中去磨练陶冶自己，决不在肮脏沉闷的斗室随波逐流。

我正处在年青时代，我一定要从现在就把生命投入生活，投入斗争，投入革命。同时还要为将来准备，更严格，更全面更深刻的锤炼自己，准备迎接中年，晚年的斗争生活。迎接战斗，迎接世界大革命。长江前浪推后浪，一泻千里的扬子江，将就是我心中最伟大的形象。让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我的胸怀，我的品格，都像那广袤无边，奔腾向东的扬子江一样吧！我要永远发挥扬子浪的精神，

永远在奔腾的长江中翻滚，向着东方的太阳，向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奋勇前进。

除夕之夜，我们“横扫千军”9个人与“红旗战报”编辑部和总部的一些人在甘斗的寝室里开了一个新年晚会，十分成功。碰到晚会我照例出洋相，不过也有进步，以前照例是耍赖不出节目，现在也敢干着嗓子，喊一只最普通，最流行的歌子了，而且也无甚羞怯了。

战报编辑部的史定谷与俞颖特别像，聪颖，矜持，也活泼爱玩如出一辙，而且身体面容举止也十分雷同。

这些同学都是出色的，比起另外一些人来，胸怀、精神、思想要开阔得多，深刻得多、高得多。与他们相交，共同作战比起与另外一些人鬼混不知要好多少倍。我热爱“横扫千军”，我要为它的巩固而努力，以“横扫千军”的组织形式去工厂、去长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今天首都26所高校联合举行游行宣传活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喊声震撼了古老而又雄伟的北京城。

1月2日

元旦，首都26所高校联合行动，在北京市举行了盛大的宣传游行活动，我也参加了这次运动。

1月3日

我完成了三千多字的文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再版）在近几年的阶级斗争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较有质量。

翻阅了古达瓦达纳的大文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①阶级斗争是何等残酷啊！在左右两派作生死搏斗时，纵然右派完美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而左派却有一万个缺点，但任何革命者都必须坚定的支持左派。

我一定要彻底解放思想、甩掉家庭包袱，我该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让别人去议论好了。历史上哪一个革命者不是在敌人的恶毒咒骂声与哈巴狗们轻蔑的狂吠声中成长起来的。如果害怕议论而不敢行动，就是最大的懦夫。还是好好想一

^① 此处应指锡兰共产党人特加·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一书。

想父子俩与毛驴的故事吧，为别人议论所左右的懦夫，是多么可悲而又多么可怜啊！

…我们也遇到过许多肮脏的争吵，虽则从没有像你所遇到的那样肆无忌惮…顺便说一句，人不应当忘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制造历史的人是不应当怕弄脏自己的手的。”

1月6日

生物系诡辩家樊立勤在今晚的辩论会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作了一个十分折中、十分公允的讲话。放冷枪，射暗箭，矛头针对校文革，针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由于某些原因他的讲话获得了很多的掌声，一些前“造反派”们疯狂地为他喝彩，为他鼓掌，盛况绝不亚于谭立夫的发言。当时把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时勇气倍增，拼命挤上台去，大叫樊立勤发言是大毒草，必须批判，并作了简短发言。这是我的第一次上台辩论，但决不是最后一次。

真是艺高胆大，无私才能无畏，只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才能消除一切卑怯懦弱的恐惧，才能大长革命的勇气！

1月8日

今天写了一份大字报“一代风骚樊立勤君可以休矣”质量还比较好！晚上横扫千军本来准备讨论红卫兵的问题结果议决回到系里去讨论。

我当然希望参加红卫兵，但一时条件不成熟，不参加也未尝不可。反正现在中央没有明文的正式文件的规定，将来如何发展不得知，而且目前的红卫兵最本质的条件还是出身。两个根本对立的队伍，都有自己的红卫兵，就是大方向完全错误的红卫兵也是红卫兵，因此红卫兵将来是必然要整顿的。

我到不希望红旗红卫兵第一，二批就吸收我，缓一些会好一些。

今天看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受到）教育很多。《多余的话》基本上都是实话，临死吐真言，瞿秋白暴露了他是共产主义叛徒的真面目。他可耻地否认了自己曾有的言行，对敌人卑躬屈膝。他对自己的分析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文人的忠实写照，这样没有骨气，这样没有羞耻，简直是共产党人最大的侮辱。瞿秋

白就是应该暴尸三天，鞭笞三百，就是这样也解不了恨。但反过来说应该把他的尸首扔到山沟里去，不要让人沾污了耳目，想到有这样一个卑鄙、软弱、可怜、无力的人，简直令人恶心！

1月9日

今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同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编者按。这是一个大事，他预示着文化革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热烈欢呼：全国继续澎湃的工人运动好得很，好得很。

1月10日

晚上看文汇报，被报纸所洋溢着的澎湃的革命热情所激励，当晚奋笔疾书写出了一篇稿子“最最热烈欢呼全国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完后读了一遍，同志们个个都称好，建议送人民日报，但因故未送成十分遗憾。当晚我建议我兵团接管“北京日报”，王复兴十分赞同，密谋策划了一回，但因没有摩托，因此未能得逞。

1月11日

上午我们去北京日报与少数派“星火”挂了钩，广播了“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致北京日报革命造反派的公开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北师大井冈山先来了一步。公开信也是我写的。

1月12日

晚，广播了中央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贺电，全国更加大乱了，北大的军训搞不下去了，只能暂缓！文化革命最伟大的功勋就是它表明了文化必须革命，革命必须前进，这是历史的宣言。

1月14日

军训正式暂停了，全校骚动，纷纷准备出走，在“横扫千军”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看来只能与小广东、徐云辉、老金等分离了。徐云辉对我说：

永别了，杨子浪！或许永别了，但不要遗憾，人生变化无穷，我会遇到新的充满理想光彩的人的。但回忆还是有益的，与小广东相交一月，她的形象的夺目光彩，别具一格的泼辣、大方，甚至目空一切的狂妄，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参加“红旗”有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来如鱼得水，觉得物尽其用了。写了几篇质量较高的大字报，出了几个主意，耳朵里充满了赞扬声。什么“像爱因斯坦一样致力于理工，但学识十分广博的人”，“杂家”，“中毒很深”，“脑瓜子很灵，鬼主意很多”，“有上海人的基础，念了几年数学鬼主意就越来越多”等等。我的工作受到了广大范围的赞扬，很多文科系的同学都对我的政治、文学水平表示赞扬，于是乎越干越起劲了。但是在另外一个环境，没有熟人的赞扬，没有女人的青睐，没有名声的地方，我能否坚持默默工作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一定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

我应该自责，我的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太多了，我精神上的软弱与漏洞太严重了，任何一个认真的有力的敌手，都能轻而易举的攻垮我。思想上没有改造好的人，在政治斗争中决不能永胜。

文化大革命是最伟大的课堂，它训练了几千万的阶级斗士，经过文化革命大风浪的中国的年轻一代，必将成为未来世界最优秀最伟大最勇敢的民族，对于未来我寄托着无限希望。13日我到《促使北京日报新生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作。

1月15日

今天北航红旗一些同学对联络站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下午开讨论会统一意见，看来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有些分歧。从下午的讨论中我们觉得北航红旗不愧为一支久经锻炼的左派队伍有很多优点值得学习。

1. 首先是敢说敢想敢干的彻底革命精神，敢揭发矛盾，决不隐藏矛盾。就是革命造反派内部他们也决不以退让和掩盖矛盾求团结，大胆的揭发矛盾进行批评。
2. 他们有很好的科学精神，能高瞻远瞩的进行分析，能顾全大局，对形势有清醒的估计。

3. 他们能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革命造反派内部能畅所欲言，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达到真正的思想统一，真正调动起广大同志。

这几天困在北京日报社内，把我浑身的精力与锐气都磨掉了，烧得热烘烘的暖气，与我振奋的精神大相径庭，四肢懒洋洋的，老想睡觉，这真是一栋修正主义的大楼。

1月16日

清晨两点，联络站的同志就把我叫醒了，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下午组织一次促进北京日报新生的宣传示威游行活动。我被推进组织组参加工作。

上午去地院、政法、矿院联络，在回来途中司机（吉普）撞了一个人，司机与车都被扣了。我们因为有事，只得马上离开去乘公共汽车。被撞的是一个老者，鼻口流血，卧地不起，伤势较重。虽然对此肇事事件，我毫无责任，但想到我第一次乘小车就碰到这倒霉的事，就怏怏不快，特别对那个司机总觉得有些内疚。

下午的游行马马虎虎还可以。

1月17日

北京日报的问题到了白热化，尖锐化的程度。我与红卫兵指挥部的董跃昌谈了一次，深觉问题不少，对“星火燎原”疑心重重，看来这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人不在工厂就在“星火燎原”。北师大井冈山在北京日报，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我的思想达到了高度兴奋的状态。

1月18日

上午讨论形势。我写了一份大字报“星火燎原的成立与红卫兵指挥部的土崩瓦解”，尖锐地指出“星火燎原”是保皇组织，是保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办报方向，和旧知识分子对办报的垄断权的保字当头的组织。并且高度地赞扬了红色工人造反派，好得很，好得很！但是大字报未能通过，甘斗他们不同意写出去，而我又急于走，不能以个人名义贴出去。我追求彻底，不允许任何折衷，离开北京日报时，心里惴惴不安。

1月19日

几天极其紧张的兴奋状态把我搞得疲劳不堪。同学们都说我呆了，劝我好好休息。

下午狠下心去上海，与红梅7朵与“广东”等乘上了9551次列车。要离开北京了，但我的半颗心还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北京日报。我们乘坐的是军车，能躺下，车厢内没有灯，大家挤在一起，唱着雄壮的战歌，真有些去长途征战的样子。上海将会怎样呢？战斗的上海，欢迎我吗？

1月24日

到上海以后，就住在公交公司的汽车三厂。接连两天参加了公交公司的联委会筹委会。两天会议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坚定地站在造反派一边，对红卫军一些领导人的错误和阴谋进行了针对的斗争，同时也力争联合其他革命组织。

听闻“北京日报”新生，心中有难言的高兴，我多少也为她出了一份力啊！又听说北大师生以军训编制四处夺权，夺了高教部，中宣部，组织部的权，十分振奋，哎，我如果在北大那也有多好啊！

“小广东”这个人真是罕见，内心无限羡慕。她的精神世界如此开朗，如此豪放，无拘无束，她背的旧世界、旧文化的包袱，显然比我轻多了。而我常常被因袭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

1月27日

复旦孙悟空（谭启泰、欧阳靖）开始拼命反张春桥；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内部斗争也异常激化，工总与二司，东方红与红革会，红三司与红革会等都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同志们四出调查。中午去华师大找于静蕾同学，想了解一下整个上海的情况，结果未能找到。上海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反扑，我已经嗅到了暴风雨前浓重的气息。

汽三造反派完全是二兵团直接控制下的地方。他们实行的完全是一套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汽三对全公交公司的左派联合，本厂的左派联合根本不热心，甚至阻挠；而对搞二兵团区指挥部却大卖力气，整整抽了五个人去搞，这合适吗？过去曾经是革命的汽三造反派今后可能往哪儿走呢？二兵团到底怎样呢？

1月29日

抛出大字报“坚决捍卫无产阶级大民主”，对汽车三场造反派一小撮头头一系列非法绑架，拘捕事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谴责，并且作了不祥的预言。把胸中满腔的怒火暂时发泄了一下。红革会的一些头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分裂主义者，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行动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嘴脸。

1月31日

把持汽车三厂造反派大权的人，实质上是一小撮政治扒手。当前三厂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夺权斗争，就是造反派内部的革命左派向一小撮政治扒手社会渣滓夺权的斗争。今天马西沙，黄虹坚，我等9人在上海分行（中国银行），解决临时工的工资发放问题。我与马西沙有不同意见，因此下午我就走了，我认为他是错误的，反对经济主义指挥部不可能解决和答应要求，但想不到他们竟然迫使这些人答应了要求。

马西沙“心狠手辣”“脸厚皮硬”看来是一个干事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想创造历史的人绝不应该害怕弄脏自己的手”。而我却非常软弱，单纯得可笑，谨小慎微，拘泥于小节，死要面子，唯恐让人不愉快，得罪了人。如果继续下去，再不改正的话，就不可能坚持住残酷的斗争和考验。不过他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善于与人讨论，太过份地奇异地争强好胜，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因此他很难与一般同志相处的。不过我们这十个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神经质和特色，处得到还不错。

2月2日

2月1日晚7点，汽三造反派队委、干事联络员和北大、清华同学、师大同学召开扩大会议。这次异常激烈，斗争复杂的马拉松会议，一直开到今晨5点。在会上我强调了矛盾转化，猛烈地攻击了打人、捕人的非法行为。

我很激动，我被这些狂人的流氓行为气愤到了顶点。这是一群扒手，政治流氓，社会渣滓的混合物；我发誓要打倒这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挑出来的牛鬼蛇神。

仔细学习了《红旗》社论，觉得我写的“坚决捍卫无产阶级大民主”中有些论点预见到了《红旗》第三期社论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情况，要加强阶级观念。

张春桥、姚文元最近传达要点摘记：

1. 矛盾转化这一点很多同志没有意识到。
2. 一个组织不敢辩论，只用砸、抢、抓会走向什么道路？
3. 造反派中有中间派、右派。工人队伍钻进了一些坏人，要考虑应付更复杂的局面，有反攻倒算，有投机，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
4. 现在打击面过宽。发动进攻时，不要过份强调干部的划分，群众起来就要注意了。“怀疑一切”是无政府主义的口号。

2月8日

接连两天晚上开了串联会，群情激昂，看来形势大好。已经开始公开点刘招娣的名了，真像工人同志说的刘家的天下是鬼子尾巴藏不了，长不了，刘家村就要完蛋了！

2月9日

上午，在十车队开了一个串联会很成功，群众都起来了。真像所预见的那样，对人民实行专政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2月11日

昨天晚上在顾志华的“火种兵团”的房子里，高中的一些同学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意思不甚大。我却滔滔不绝的讲了一通。大学四年，我掩盖自己的面貌处处约束自己，因此班级里关于我的流言蜚语不多。而在“红旗兵团”却肆意地放纵自己，卖弄自己，炫耀自己，欣赏自己，影响十分不好。绝对不能过高地估计自己，过高估计自己，在甜言蜜语面前神魂颠倒是十分危险的。我对自己一定要有清醒的估计，切不能在赞扬面前栽倒。现在还不是锋芒毕露的时候，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别人的意见，好胜心、自尊心太强只有坏处绝对没有好处，总之要尊重同志。

2月14日

在三场搞的大方向是肯定对了。“二兵团”与“工司”的矛盾日益尖锐，看来调和妥协不了啦。最近翻了莫伯桑中短篇小说下集，有几篇相当奇异，有思想，例“遗产”等。但是毕竟是个可怜颓废的浪荡公子，脑子里就是黄的，粉红色的，灰色的东西。

下午去参观了红卫兵电影制片厂，上海人美，新师大造反派联合举办的革命造反派画展，相当不错，这才是斗争的艺术。绘画的表现力与文字相比，优点太多了。林彪同志讲过，我们要把鱼目剔出，但要把珍珠还给人民。这个画展就是一颗熠熠发光的大珍珠。

林彪同志讲过：“要敢于牺牲包括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上。”

对生活我也要抱这个态度，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投入战斗。“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一个人不怕死，还有什么不能舍弃呢？战斗吧！

2月19日

明天就要走了，与顾志华告别，他送了我一本毛主席，马恩列斯语录，心中十分欢喜，政治真是灵魂啊！生活中除了政治斗争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影响着人的灵魂和脉搏呢？难道男女之情有这样的威力吗？那些本来在我的眼里闪闪发光的女性，在这场伟大的风暴中不是也变得暗淡无光和索然无味了吗？政治生活是一个人最高尚最伟大的生活，缺乏政治生活的人就是一具地地道道的行尸走肉。物二（3）的陈敬原是联络站的动态员，她看来很愿意与我谈话和相交，与俞颖似是一个文静矜持但又善词令的姑娘。马西沙、小广东有很多优点，但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他（她）们对自己对我们这批人，自然包括我，都有不恰当的过高的评价，这就是她们狂妄态度的本质，我受了些感染，听了些不合分寸的赞词，便也飘飘然，开口闭口他妈的，颇有些了不起，当然左派的样子了！这是十分危险的、可怕的。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2月21日

20日12:41乘106普客离开上海返京，上海再见了！一年半以后再拜会你！此次上海之行虽无干什么大事业，但大方向全然正确，斗争策略也很漂亮，打胜了一仗精彩的夺权战，对文化革命的新阶段大联合大夺权阶段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性和理性的认识，比起北京日报那次窝囊的事来好得不可以比拟！

对清华蒯派与八八派之争颇感兴趣，蒯大富，手脚不大方，搞权术打小算盘，搞小动作，将来无多大出息。关于学校新北大公社之事，有些疑虑，回校以后再说。

学校里看来也要搞三结合，光是学生不行，北大就要比清华好！

回校以后到班、年级、系里，切勿以左派自居骄气凌人，还是当小学生，多看多听，抓住有把握的问题，可以表一下态。切不可到处乱试锋芒，弄到树大招风，成了矛盾的焦点，就不好办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将来更加伟大的斗争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切不可卷到班里小事小非的小漩涡中。新交了一批朋友，是斗争把我们聚合到一起来了，但没有技物系，无线电系和数力系的，尽是中文系、历史系、物理系、经济系、哲学系的，如果将来搬到三线去，我又会变得孤独了！战斗的友谊是何等珍贵啊！

2月23日

昨天清晨回到了北京，学校里面已经由乱而治了。经过军训广大同学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都有很大增长，这是新北大走向杭大的第一步。“新北大公社”2月15日正式成立，我被缺席批准为第一批社员。年级里在批判“星火”（反革命小丑樊立勤的秘书组），系里在批判“抗大”，全校革命师生空前团结，形势大好。

“红旗兵团”解散了，可能离校太久，觉得还有些留恋。

昨晚与徐云辉聊天，她向我介绍了北京日报斗争的情况，也是错综复杂、轰轰烈烈。

今后我何去何从呢？我还能干些什么事呢？北大会不会再发生什么变幻呢？看来我只能收敛一下锋芒了。对小是小非、不是不非还是妥协一些好，稀里糊涂一些好。

今天下午我找任瑚琏谈了一下关于我参加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的问题，他肯定了我一个月前戴上的袖章是正式的。

晚上年级开了批判“星火”头目反动言行的大会。班里也讨论了批判黄仲的问题。整别人的人，到头来，归根结底整的还是自己。

2月24日

下午系里开了批判牛占文及以他为首的“抗大”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我想，对“星火”们也许太狠了，而对牛占文也太温了。

“新北大公社”数力系缺乏战斗力。我想搞一个小组，研究一下批判刘、邓、陶的问题。

2月27日

黄虹坚从上海回来了。这个连一秒钟都不能安份守己的人有趣极了，充满了顽皮小男孩的豪侠气概。

中学关于出身论的争论引起了浓厚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出身在一个人的阶级地位里究竟起什么作用呢？千真万确还是毛主席的“重在表现”最正确，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重在表现”是毛主席的，不是彭真的，砸烂彭真的狗头！

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错综复杂的形势提出了无数尖锐复杂的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发展，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解释文革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问题。只有这样，群众运动才有信心，才能无往不胜。

十月革命前夕，伟大的列宁完成了《国家与革命》这篇伟大著作。现在，应该有另一篇雄文《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在最近与张春桥同志的谈话中一再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绝对错误的，反动的。

《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说，建立新的国家机构其实质是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当前，无产阶级专政最强大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混入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切革命运动和社会意识的改变，最终都要落实在政权问题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一月革命的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左派革命群众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这场伟大的风暴中，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地将有革命性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揭露、斗争和镇压的能力将大大加强，对付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内复辟斗争的力量也将大大加强。总之，我们只有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最终消灭资产阶级。

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中，反革命分子乔兼武，伊林涤西凭着高度的反革命嗅觉也从反面接触了这个根本问题“政权”。他们大叫大嚷“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要党政合一，建立革命委员会；要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他们利令智昏，打着改善机构的幌子，实质上想整垮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专政。这是当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专政本身能意识到这个任务，这也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国家机构组织形式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形式与国家机器的组织形式的矛盾（即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实质上也反映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只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明确地宣告它新的伟大历史使命的群众运动。

3月5日

3日郭罗基大字报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当晚引起了轰动。思考一天后，我们贴出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在全校反对郭罗基大字报的冰天雪地中，犹如一枝雪里独俏的“红梅”。

3月7日

从对郭罗基大字报的分析和认识中，我得到了很深刻的教训，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认识是个过程。我们对郭罗基大字报的每一次动摇，都使认识进一步趋向深化。今后，分析问题动摇时，不要泄气，不要害怕，要利用“动摇”、分析“动摇”，自觉地促使认识深化。此外，从对郭罗基大字报的分析中，我找到了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北大“温”字的“秘密”，解剖了十月以来，北大运动的整个纵断面，对北大运动中群众发动面不广等弱点有了一个科学全面的看法。这张大字报的水平在整风运动中是鳌头独占的，它代表了一种思想高度。我再也写不出能超过它的大字报了。在整风中，我想对聂元梓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文化大革命真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大课堂。在实际的矛盾斗争中思潮澎湃，政治水平得到了远要比过去深刻得无可比拟的大提高。“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时机，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要努力地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学习，把自己培养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阶级论者。

王复兴说我的思想方法有一个特点，就是抽象。但我却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不如说，我是基本的唯物主义的。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灭亡了，这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我在分析问题，观察形势的时候也能从阶级斗争，思潮斗争、不同的政治力量的斗争，这些方面来观察和考虑问题了。我的3月6日的大字报第一段，就是我个人运用这种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好的范例。

3月10日

3月8日孙蓬一同志讲话。我对他的讲话心里不满，觉得他给整风的群众运动泼了一大瓢冷水。9日，在考虑了整整一个晚上后，觉得自己对孙蓬一的讲话错在哪里，有什么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想法，因此于中午贴出了大字报：

《反“老孙”论》

一献给反杜林论的拙劣宣传者孙蓬一

扬子浪·文兵

大字报贴出后马上引起了轰动，从中午12时直到深夜，以致第二天，围看的人络绎不绝。大字报上写满了批语，有嘲骂的、有赞扬的，看来我的大字报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在为真理而战、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为整掉北大的“温”字而战。我将永远前进。

中午,大字报贴出去不久,在29楼北面碰到老孙骑车而过。我把他叫住了说:“老孙,29楼东墙有一张关于你的大字报,快去看啊!”。他疾車而往,我和顾志华尾随而去,只見孙蓬一在我的大字报前佇立呆看了一分钟,然后面带不快地飞车而去。我觉得不快,他为什么连这张大字报都不愿看完呢?我的大字报有个人情绪,有些提法太激烈太过头了,对孙蓬一同志使用了十分辛辣甚至带有不负责任的攻击性语言。一方面个人主义作怪,发牢骚;另一方,的确是希望批评得尖锐些、泼辣些,希望孙蓬一同志能听得进去。而他却连大字报没看完就走了,我是多么不愉快啊。

徐云辉在我的大字报上贴了一张小字报。大意是:扬子浪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十足的风头主义到看不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事实,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值得深思。扬子浪之流可以休矣!

还有些人说我只是卖弄风骚而已,当然,其它的嘲骂还大有所在。我扪心自问:我当真是从十足的风头主义出发吗?我不否认我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但把我这张大字报说成是风头主义的产物,是十足的凡夫俗子的眼光。它是老孙讲话的产物;是我对北大整风运动分析的产物;是我对老孙的意见书。

我考虑问题,已经有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我将休息。在最近,形势如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我基本坚持我的大字报。因为我觉得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我是站得住脚的。但我不准备应付辩论,老实说,你有五十张的大字报来批判我,如果不怎么样,根本压不倒我的大字报的雄辩气概。同时,我也不想再另写大字报,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再阐述的了。修正一些错误吧,意思不大。反正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是不可抵销了,再写大字报就毫无用处了。

听说今天徐运朴,侯汉清又贴了一张大字报,对聂元梓、孙蓬一同志的两次讲话提了些意见,可能局势要发生变化。我务必保持冷静的头脑,要注意事物的界限;小事小非要服从大事大非。

对于“红旗兵团”的一些老战友,如徐云辉、黄虹坚还是高姿态的好。可我觉得难受,不想见他们。

3月15日

看来历史已经否定郭罗基的大字报了,但是有些问题我还是想不通。

最近几天参加了工代会发票的工作，主要地点在北京玉器厂和北京料器厂。

好几个打得很响的战斗队伍哑了，如“红梅”、“北京公社 0363”、“横扫千军”、“北京战斗队”，可惜极了。

北大运动中的缺点，看来暂时不能克服。北大的特殊性会在运动后保留几年的。

3月18日

“无私一身轻”，我一不怕批判，二不怕丢名失利。为捍卫真理，应该积极投入辩论，就算是与校文革有不同意见，又何惧之有。我才二十几岁，大学时代的血性青年，风华正茂，现在不闯荡闯荡、不锻炼锻炼，难道要等到暮气沉沉的时候再斗争吗？青年人抓住真理，就有所向披靡的气概。对错误思想、错误言论，不管它是什么人讲的，都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进行批判。

小广东和马西沙说我谦虚。我说我很狂妄。俞政解释说：扬子浪待人接物比较谦虚，但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精神上很狂妄。

只要我抓住毛泽东思想，我就敢蔑视一切错误思想。光焰万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3月19日

我应该休息一下，整顿一下，检查一下了。应该冷静地考虑一些问题了。阶级斗争是复杂的，绝不是儿戏，我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不能被风头主义拖入错误的泥坑。三星期内不准写大字报，切切此令，必须严格遵守。在我写出了：《彻底制止“批判资产阶级整风方针”错误口号的流行》后，我再也不想写了。我远离了斗争的漩涡。

3月20日

最近看了些毛主席自1958年以来的讲话和著作，使我革命精神大振、思想大解放，脑袋里辩证法陡然增加了好几倍，看到高兴处，得意忘形、手舞足蹈、兴奋异常、不能自己。精神粮食何等宝贵啊！

马克思的书与列宁比差了一个时代，列宁的书与毛泽东比更差一个时代。主席分析问题，充满了辩证法，特别善于抓住本质，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往往一句话就把事物的本质道破了。又像洪钟力撞，“洪”的一声就把思想的大门敲开了，顿时令我联想翩翩，收获非凡。而马克思与列宁，往往叙述得繁琐一些，学术气氛浓了些，同时不切合我们时代的地方多了一些。今后，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都要读，但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来提纲携领，这样一定会事半功倍，效果极好。

3月26日

今天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十週年纪念日。晚上，“中國戏校东方红”为我们演出了京剧革命现代戏《沙家浜》。京戏的容量很大，表现力丰富，感染力特强。扮演郭建光的那个演员，演来英气逼人，是个大有前途的青年演员。

不知怎么搞的，我开始脱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漩涡了，空得难受，心里发慌，有些虚，我是多么渴望斗争啊！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软弱性，这就是我的本质。这个本质在文化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暴露无遗。

3月28日

昨晚，《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中国青年出版社《红岩》责任编辑张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红旗战斗队罗广斌同志生前战友陈家俊（成岗之原型）来校作报告，愤怒控诉重庆反动派杀害《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

杨益言同志说到了1965年江青同志与他们的一次谈话，江青同志问他们：“你们知道资产阶级作家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改了九十多遍吗？”答：不知道。你们知道封建文人曹雪芹写《红楼梦》写了一辈子吗？答：不知道。江青同志接着讲：我准备化十年时间把《红岩》拍成电影，改成歌剧、话剧。江青同志说：许雲峰、成岗塑造得比较好，江姐还可以塑造得更好一些。

27日下午四时，陈伯达、戚本禹同志来我校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对教改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晚上，召开了一个串联会。我斗胆上去发了言，效果还可以。今后，我要“敢”字当头，要做自己从未做过的事。

教改提到日程上来了，大批大改好得很！

3月29日

觉得心很烦，书读不下去，一些具体的实践工作也不愿去做，可能光想干出风头的事情了。这种风头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些滋长。

我必须清醒地估计自己，自己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实践斗争。我应该努力补课，多学一些实践的东西，多参加一些激烈的面对面的斗争，少搞一些纯理论的无用的东西。我在高度发挥自己革命性的同时必须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做一个谦虚的革命者。

4月1日

昨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戚本禹同志的重要文章《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中充满了战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刘、邓黑司令部轰了一个重磅炮弹。这篇文章的发表，证明了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了伟大胜利。刘、邓是不折不扣的三反分子这个案已经定了。毛泽东思想宣判了刘、邓的死刑。戚本禹的文章好极了，简直溶政治、历史、文艺为一体。恩格斯曾说：“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而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戚本禹同志手里，历史不仅是诗，而是刀，是剑，是枪，是一篇声讨一切害人虫，牛鬼蛇神的檄文，是判决帝修反死刑的宣言书。戚本禹同志哪里是在写历史啊！它是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战斗。狂风暴雨般的红卫兵运动，激励着年轻的革命的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满腔热血的描述着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它不仅是在歌颂历史上的革命，更重要的他是在歌颂红卫兵运动！不是吗？头包红巾，腰围红布的义和团战士与手捧红书，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战士不是一脉相承的吗？他们都是群众，都是中国历史的首创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历史学家就应当为他们唱赞歌，为他们大喊大叫。中国历史是一把寒光闪耀的利剑。

车尔尼夫斯基说过，美学不过是一个战场，对极了，任何艺术都是政治的表现，文艺批评的实质就是社会批评。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难道仅仅是一篇文艺批评吗？明明是一篇大义凛然的，正气磅礴的政治檄文。

破字当头，先破而立，破中有立，被历史证实了。在十个月的大破中，在文艺批评的领域，历史的领域不同时也实行了大立了吗？这个大立首先是历史为政治服务的铁的原则，文史正在被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

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不仅针对着刘邓，也刺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我总觉得他用历史在影射着他们，它描绘八国联军的暴虐，俄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们的虚伪，他是在鞭打现行的反革命帝修反。

罗广斌烈士曾说：他在《红岩》中是把梅乐斯当成现行反革命来写的，好极了！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就是把历史反动派当成现行反革命的祖宗，主子，祖师爷来鞭笞的，这是为政治服务的正确态度。晚上全校同学集会庆祝戚本禹同志文章的发表，后又至清华，地院，矿院游行至今晨3时才睡下。

昨晚九点去找过李醒尘，他想组织一个写作组，需要一些同学当助手，让我去。我想考虑一下，应该不应该去？

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是我最坏的脾气。

今天下午我校五四操场召开“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年，庆祝新北大红卫兵成立大会”，李敦白、聂元梓、蒯大富等参加了大会。聂元梓讲话，她指出：我们现存的教育制度是从清朝末期演变来的，又受了帝国主义教育制度和修正主义教育的影响，是一个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杂烩。这个教育制度在国外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服务，在国内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句话不错。

4月2日

昨晚，校园外北面，有一储放着二十几万斤芦苇的库房起火，熊熊的烈火映红了半边天。救火回来时，已是清晨3时了。当天晚上清华、北大、人大、外语、体院数万人参加了这场救火斗争。

我班的第一批红卫兵只有五个，没有我，一些老战友都为我不平。我热切想往参加红卫兵但绝不把它当成目标，它并不妨害我继续战斗，我永远不拘泥小节，不让小事小非绊住我的腿。但是战友都是红卫兵，都在为我惋惜不平，因此有些不好！

早上我还未起床，王复兴就来叫我了。我们一行十一人，马西沙、王复兴、黄虹坚，我，任瑚琏，钱凤娟，杨桂香，王渊涛，徐森，陈双基，张文虎，去香山春游。我们11人9辆车，马西沙带我，飞车直奔香山。一路上谈笑风生，你追我赶，春风迎面扑来，心旷神怡，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们游览了碧云寺，卧佛寺，樱桃沟，午饭的时候大喝啤酒过馒头，什么东西都吃，吃得千奇百怪，豪放，随意，真是痛快。

傍晚起大风了，天阴沉沉的，落起雨滴来了。我们冒风顶雨往回赶，在暴风雨前夕，我们像雄鹰一样在公路上飞驰，壮志豪情满胸怀。

我的这些朋友，真是朋友，豪放的，忠诚的战友。往来不过几个月，友谊远远深过了虽相交几年但情淡如水的相识。这样的朋友，我要精诚相开，以全身心相交。

4月5日

今天写了一张大字报“针锋相对迎头痛击”批判黑修养，包括五个部分，以“力四流体红烂漫”名义贴出。

今天是清明节，联动分子蠢蠢欲动，上午三百余联动分子在八宝山活动，下午就到颐和园抢劫船只，殴打游客，（所谓镇压流氓），横行霸道无法无天，颐和园的管理员无可奈何。下午4时，首都红代会工作组一声令下，我公社红一团全体战士，杀奔颐和园与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农大东方红，钢院919，清华井冈山，革命工人，解放军把颐和园围了个水泄不通，里里外外大搜查，捕获证据确实的联动分子数十名，大快人心。但他们负隅顽抗，疯狂挣扎，谩骂红代会是黑代会，流氓代会，贼喊捉贼，大叫打倒联动，镇压流氓，叫人哭笑不得。

4月7日

昨晚，“横扫千军”开会，天南海北乱聊了一气后，就言归正传开始开会，讨论稿件。新华社对外广播部向我们约了稿，要我们写一篇文章，介绍战斗队是怎样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提高认识的，供对外广播用。

4月9日

昨天下午听说，地质东方红等（红色联络站）聚集了几百人准备抢劫材料，我系马上调去了50人，至民族文化宫。晚5点时，地质东方红戒严，封锁民委大院的大门，晚十时半，在广播车指挥下开始对民委大楼发起全面冲击。将我方人员一一拉出，挑起大规模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我们50人浴血苦战，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死守。他们砸玻璃门窗，大打出手，无所不用其极，公开对抗军代表命令，继续武斗，终于在凌晨3时半左右占领了全部房间，抢走了全部材料。我也被迫参加了武斗，简直欺人太甚，可忍孰不可忍。

今晨六时回校，嗓音嘶哑，全身无力，几乎使尽了力量，得几天后才能恢复。挨了打，受了气，丢了材料，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出气，我们北大他妈的太软了。

洪涛、吴传启，卢正义、徐非光他妈的处处与北大为难，绝无好下场。我们的战斗力将得到空前的发挥，新北大决不是好惹的。

4月12日

昨晚6点半，地院东方红纠集北邮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院校，开来了六辆宣传车到北大来捣乱。实在忍无可忍，北大广播台开始教训他们了，自觉聚集来的北大同学掐断了他们的电线。但他们继续不断地诬蔑攻击北大，冲突越演越烈，十二时许，武斗终于被他们挑起来了。北大同学终于渐渐醒悟过来了，万众一心，把他们的宣传车全部推出了北大。这时各校都不断有人往北大冲，地院倾校出动，武斗不断发生。晚三时，中央文革办公室来了三点指示，要他们撤离。接着在大饭厅，开了大会，孙蓬一作了讲话，群情激昂，情绪高昂。

我彻夜未睡，全校同学也是如此，但今天大会依旧召开，很成功。

下午地质又来了一批人刷标语，全部给轰走。宣传车整个被占领，喇叭被拆下，机器被搬下，空汽车也给开走了。新北大三师八团的大旗在车上高高飘扬。物极必反，欺人太甚，反抗就烈。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铁拳不是好惹的。

晚上全校召开了誓师大会，孙蓬一气壮山河的讲话，不断地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打断。会场上红旗乱舞，群情激昂，空前壮观，一阵阵的欢呼声震撼了整个北大。

孙蓬一的讲话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讲得出来，我决心跟着孙蓬一干，不屈不挠地斗争。

新北大岿然不动，
聂元梓红旗不倒！
让一小撮反新北大的混蛋们的黄粱美梦去见鬼吧！

4月14日

昨晚谢富治同志接见地质，北大，搞了些误会，孙蓬一讲话竟然大发政治牢骚炮轰起谢富治来了。昨晚几千人集合准备去冲公安部，找谢富治同志评论，亏聂元梓同志阻挠才未得逞，避免了一场大祸。

听小广东告诉我，宋一秀对她讲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在四月十日单独接见了聂元梓，孙蓬一同志，江青同志说过，对吴传启至少要在政治上划清界线。不知是真是假？

4月17日

中央文革14日，10日两次接见大专院校代表，批评了北大，也批评了孙蓬一同志（没指名）。高校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地质东方红，批评北大，这一仗看来打输了，老孙这个家伙头脑太简单，压制民主老子天下第一的作风太恶劣了。

我这次之所以会犯错误，归根结底一句话，没靠毛泽东思想吃饭。以前交游不广没什么消息，老老实实学社论，学毛著，形势大致也看得准。现在有些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老是估摸后台之类的，反而上了当。我这次跟孙蓬一走就是他妈的上了当，谁知道孙蓬一在那儿乱搞什么，坚决不靠小道消息革命。听说有一次接见，孙蓬一问陈伯达同志李雪峰能不能打倒，陈伯达同志笑了一下，老孙回来就乱说中央文革默许了，结果以讹传讹，变成中央文革同意打倒李雪峰，公社发了一个声明，闹了一个笑话！

这一次孙蓬一不可能再搞同样的笑话吗？完全可能。显然几次讲话，江青同志也是偏着我们的，她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地质东方红，她说的与康生、关锋有些不一样没什么奇怪，但与伯达同志有些差别，却使我感到诧异。

4月18日

北大与地质看来还没完，还要打。新北大公社里面是由一个混蛋，就像帮倒忙的狗熊一样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到晚挥舞大棒等着打逆流，这种人是十足的暴发户，北大让这样混蛋得势，前景实在暗淡。

徐运朴、侯汉青受打击太不应该了，北大上一次整风就是给孙蓬一打死了，这一次如果再不好好整一下，我看实在危险。但看样子校文革又不想真心实意地来整风，这样下去北大一定越搞越死！

晚上与马西沙、王复兴聊，特别感慨，马西沙满腹牢骚，都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了。倒底怎样理解目前形势呢？我看很困难！

运动越进入后期，分歧就越深刻，正如 XX 同志指出的那样，在六月一日后起来的人中有以一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起来的，由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起来的，它们分别以这两种世界观来估摸，认识想象文化大革命，指导文化大革命。而文化革命越近尾声，就越显出本来面目，必然与很大一部分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抵触。这些人看到革命没有按自己想象的那样发展，他们就会跳出来，拼命发挥自己的影响企图扭转历史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斗争还十分尖锐，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我们务必要把住方向啊！

4月19日

早晨张清华找我，正式通知我去《教学批判》工作。被派往景山学校调查组写调查报告。下午去景山学校。

4月20日

下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普天同庆。这是一个震动大地的事情，毛主席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宣言》指出：“你们的宣言没有棱角，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就是要斗争。这个宣言就是要让你们上台，让它们下台。要有气概，这是震动大地的事情。”

文件要有气概，比巴黎公社还要有气概。这不是上海的宣言，这是北京的宣言，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可以参考《共产党宣言》。理论上要有东西，要有文化大革命，你们的宣言要有历史意义！将来莫斯科革命可以向你们学习。从革命委员会成立，把批判刘邓引向一个新高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你们还不大

做文章？要全面宣布刘、邓、彭、罗、陆、杨的罪状。从你们这里突破一点大做文章，宣布彭、罗、陆、杨的死刑。要讲一些道理，还要有一些具体东西，把最不好宣布的材料写进去，放开手脚大胆些。（伪造的）

4月22日

（《关于景山学校调查报告》）初稿写完了，还可以。我一定要打掉懒字，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4月30日

最近学校里关于整风问题又开展了一场大辩论，今天上午郭罗基终于忍耐不住跳出来在“0363北京公社”召开的整风串联总结会上作了演讲，除了对这次整风和孙蓬一无政府主义的谴责外，还对上次的整风辩论翻了案。其基本观点与我的大字报“反老孙论”、“彻底制止资产阶级这一错误整风口号的流行”相仿，可我目前处境十分矛盾，老实说老孙错误很多很大，但如果也揪住他不放，那是否客观上配合了吴传启之流呢？

老孙这样下去是十分危险的，今后的形式将越来越不利，我一定要兢兢业业认真地分析形势，后发制人。我们新北大正处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前途十分艰难。

5月5日

昨晚在中关村技术物理系大楼，聂元梓同志给我们几十个人做了一个报告，分析了当前北京市的形势。总的来说形势是有利的，但斗争还十分困难。一定要更加谦虚谨慎的前进。晚上“0363北京公社”故意挑起事件，制造分裂，破坏了纪念毛主席大字报发表9个月的大会。“0363北京公社”的分裂活动已经走得很远了。

5月7日

应该很好地研究对“论修养”、“人的阶级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将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今天晚上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论修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一些基本点我都在自己的批判文章中阐述了，几乎同样深

刻，但叙述得不清楚，不准确。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人的阶级性”的文章很不错，“事物的实质是在矛盾中规定的”，这句话很可以概括为那篇文章的总的思想。且有两方面内容：1 事物的质是有矛盾规定的，2 事物的质随着矛盾的发展而发展。

沈阳部队关于培养雷锋的经验，关于引导雷锋去认识万恶之源私有制这一段显然是反动的，是刘氏“人的阶级性”理论的翻版。

5月9日

上午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徐仁同志来我校作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下午去颐和园游泳，这是第四次了，第一次是在5月2日下午。今天昆明湖上风大浪急，游起来十分吃力，但也充满了另一种滋味，与水奋斗也其乐无穷啊！

5月12日

上午去生物研究所献了血，200cc。目前文化大革命无论在全国，在全市都遇到了困难，甚至有倒退现象。反复和曲折是不可免的，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在全市、全国连续发生的大规模流血惨案，和大规模武斗事件，标志着政治斗争的异常激烈尖锐和不可调和，也说明了有坏人在挑动。成都5.6惨案死伤三百余人，河南五四惨案也伤亡惨重，各地保守派对造反派猖狂反攻倒算绝无好下场。

最近写了好几篇大字报，皆以“红梅”、“横扫千军”的名义发表，其中有一篇《彻底批判〈井红〉反动思潮，解放二个一大片》提出了新问题，很有影响。老孙在一次会议上好几次提到了这一张大字报。

最近读了陈伯达、艾思奇同志写的关于毛主席四篇哲学著作的辅导材料，收获很大，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林彪同志及其他革命派的中央同志，才紧跟毛主席跨入了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大阶段——毛泽东思想的阶段。而刘少奇呢则由停滞走向了彻底背叛。历史的辩证法是多么无情啊！

5月16日

昨晚陈奎宁与我交谈，向我指出了很多缺点，特别是风头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的确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有很大进步的，但某些问题，却暴露得更彻底了，交的朋友基本上也是好的，但也受到了不少坏的影响。变得更加不朴实，不谦虚，不谨慎和不联系群众了。

不能联系群众，不能与群众一块儿战斗的人决不能做出什么事情来。我应该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群众工作能力，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英雄主义余毒。应该谦虚，谨慎，待人诚恳和气，不要去沾染那些高干子弟特有的狂妄，浮华的习气。应该正确的评价自己，评价我们这一帮青年知识分子。“修养”是错误的，但绝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思想改造。我还是应该在斗争中不断反省，不断前进，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打到一切狂妄，暴躁，歇斯底里，反复无常颓废的小资产阶级表现，坚决打倒！

一九六七年

5月20日

看了电影《南征北战》，这是部江青同志肯定的好影片，观后深感十几年来电影界和平演变的严重性。十几年来我们的电影艺术不是进步了而是后退了，不是日益无产阶级化，而是一步一步走向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解放初期，有很多像《南征北战》这样的电影，带着浓厚的老区气息，一句话带着延安味。整个影片思想性强，纯朴，感人，充满着无产阶级的感情，可是1957年以后，这样的风格这样的影片踏遍影坛都找不到了，可见毛主席在1963年、1964年二次对我国文艺界的抨击，是何等正确，又是何等切中要害啊！

16日晚广播了“通知”，17日《伟大的历史文件》发表，何等激动人心啊！

“通知”和“伟大的历史文件”的发表彻底澄清了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糊涂看法，简单明了地描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图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通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共产党宣言，是毛主席思想的又一颗灿烂夺目的钻石。

“通知”和“伟大历史文件”的发表惹得我脑海里思潮滚滚，数日不得安宁，心神不定。我总觉得这两个文件的发表是毛泽东思想对无政府主义（陶铸）的伟大胜利。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以陶铸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统治和泛滥是十分

沉痛的教训，至今流毒还十分广泛，影响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而“通知”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立场，是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的。“通知”是比“十六条”重要得多的文件。

5月25日

四月初掀起的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高潮没有持续多久，就衰落下去了。内战代替了外战，武斗代替了大批判，北京市运动的这种倒退和反复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直到5·16通知重新发表，这种退步才结束。而大批判的高潮也以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声势重新发动起来了。

那么倒底是谁充当了这种倒退和反复的策划者呢？在中央应该谁负责呢？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是这次文化大革命重要的教训。5·16通知的重新发表就是对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人的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深刻批判。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而积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将5·16通知稍经修改后，在1967年5月16日带着全新的意义重新发表了。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对5·16通知作了伟大的评价，而“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讲清楚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问题；至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达到了彻底明了的地步。这必将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进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彻底胜利。

听说公开发表5·16通知是主席越过中央文革亲自决定的。因此发表显得突然、匆忙，人民日报有些措手不及。这与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情况有些类似。

5月27日

这几天紧锣密鼓地进行活动，准备取消校文革，建立革委会。昨天下午与聂元梓座谈，晚上密谋至深夜。今天上午又商量了一天，中午与聂元梓、孙蓬一座谈。看来，聂元梓同志比较坚决，有造反精神，而老孙却有些害怕了、有些畏惧了。“新北大”校文革，公社总部的领导核心问题不解决，北大的问题就无穷期。孙蓬一不干，我们也要逼你上马！目前这场斗争是空前激烈，空前尖锐的，胜负属谁还很难定。

5月30日

看来是退隐的时候了，还是安下心来，老老实实学习一些东西吧！

这几天北京市两大派的斗争不但没有趋于缓和，反而一日紧似一日。

反周总理的逆流一日猖獗一日，真是嚣张一时，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去认真研究，认真阻拦。倒底谁是后台呢？周总理倒底有些什么问题呢？值得深思。

在谢副总理转述毛主席同意的“关于清华运动的四点指示”后，在清华革委会成立前夕，414总部依然成立，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对清华414总部的成立的背景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同时，最近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都相续发表观察员文章和编辑部文章，揭露“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尖锐地提出了《北京日报》为谁说话的问题。

同时“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借故出走，不知是为了逃避斗争呢，还是为了让底下的同志更加放开手脚地干？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真是耐人寻味。真是比流血斗争还要残酷一百倍的不流血的政治斗争。

看来，用无政府主义之类是解释不通的，这一场斗争用抹稀泥来解释也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教训啊！

炮轰周总理与“414总部”的成立，就是当前资产阶级的新动向。我总想写一些文章，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但不知为什么老坐不下来。

6月2日

昨天我校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会。首都革命造反派一百多个单位和二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名外国朋友出席了大会。同日上午毛主席全身塑象举行了落成典礼。下午举行了各种体育表演。晚上去北京日报社参加东方红兵团召开的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忧虑中，茫然、彷徨，不知向何处努力，阶级斗争的形势错综复杂到了极点！

6月3日

今天给徐企成，洪得炜写了封信。给得炜的信摘录如下：

“革命是最有权威的了。革命所产生的宣传效果是无以伦比的。因为革命时期阶级利益的剧烈冲突，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的、地位上的得失和变迁是如此激烈、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以后好长时间都没齿难忘。归根结底，共产主义还是要依靠暴力，依靠革命的物质力量，依靠对各阶级人们的个人利益的粗暴干涉来实现。那种迷信纯精神力量，把‘突出政治’歪曲成‘突出修养’的蠢驴们，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可耻的叛徒。”

语言虽然不是准确的马列主义化的，但思想的火花是很可贵的，有很多正确的东西。

6月6日

清晨，陈伯达在红代会讲了话，尖锐地批评了北大，空前尖锐。一霎时，燕园风云突变，搞得人稀里糊涂。

中午，聂元梓在26、27日，两次与我们座谈会的所谓“纪要”，因靳枫毅泄密，而被公布出去了。“纪要”有歪曲和捏造，因而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6月8日

“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派总部”成立。相应的组织，“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也发表声明，宣告成立。

晚上，聂元梓讲话，空谈了一通，继续文过饰非。两派马上表态；飘0井团，纷纷说糟透了，大毒草。一霎时“聂元梓回头是岸，孙蓬一下台滚蛋”；“炮轰聂元梓，打倒孙蓬一”的喊声充满了燕园的上空。联合战斗团说“好极了”，而我则说“姿态太低”。

6月12日

这几天太痛苦了，观点飘忽不定，老是想喝酒。一会儿想进飘派，一会儿想当逍遥派，搞得神魂颠倒。11日通宵未眠，搞得全系，全年级都因我的动摇而

人心惶惶。我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6月9日贴出的“6·6串联会声明”相当有水平、有观点。“6·6”串联会就是依靠这一纸声明站住脚了。

6月14日

今天下午，“6·6”串联会举行成立誓师大会。38楼前，红旗林立、歌声嘹亮、“6·6”战士个个斗志昂扬。大会进行了刚一半时，乌云密布，下起雨来了，在狂风暴雨中，“6·6”战士的斗志更加昂扬了。大会结束后，“6·6”战士冒雨举行了游行。队伍声势浩大，战士斗志高昂，毛主席语录歌，革命口号声声不绝，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接着，一千四百多“6·6”战士在办公楼前的毛主席塑像前宣了誓，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下午这个会，开得好，使北大为之一振，对立面明显地树立起来了。整个北大无头无绪的动乱，看来将在相对稳定的两派对立中进行了。

6月15日

从昨晚起，因为聂元梓没有参加“北京公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北京公社”、“革造总部”、“红旗飘”开始了所谓的静坐示威。整个静坐示威没有“静”的感觉，毫无悲剧气氛，吵吵闹闹，俨然一出滑稽剧。不知什么原因，我在理智上知道不能反对“北京公社”，但感情上却特别厌恶这个0源记杂货铺。



(上图：1968年春，北大西校门，作者与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同道)

6月19日

心里特别乱，对内战很厌恶，特别烦恼。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几乎从来没有这么烦恼过，这么受气。精神和身体的健康都受到极大的摧残。

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里外外都不是人。校文革怀疑、林家铺子谩骂，两边都对你施加压力，要想坚持“6·6”的正确立场还真不容易。

昨天下午，和王复兴、广东（黄虹坚）、王英男去颐和园游玩，在后湖游泳。王复兴和广东看来真有点意思，当然很微妙了，知趣一点好。此前早有些觉察，但这次我的看法好像是定案了。从颐和园出来已六点多了，步行到海淀，吃了一顿便饭。整个过程好像特别别扭，特别是到后来，特别不是滋味，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G是继H之后，又一个对我产生很深影响的同志。我常常说，文化大革命前有些曾经对我是光彩夺目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变得暗淡无光了。因为革命使我的审美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H就是这样，自然还有些其它的主观原因。而G的风格是和文化大革命一致的。除了王复兴以外，G对我算注意了，但看来有些基本分歧和鸿沟。而我毕竟有些狂妄，常常引起别人不满。G过去（三、

四天前)一直是我的“深刻思想、玄妙字句”的最钟情最可笑的崇拜者,但现在显然不是了,很冷淡,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自然,我的头是不会向任何人低下的。忘了这微不足道的小事吧。对诸如此类的一些人还是明智一些好,千万不能跟紧了,抛弃了政治原则。我应该独立,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力量。

我的思想状况在恶化,在坏下去,我担心,忧虑。

抽烟、喝酒、浪荡、无所事事、空发议论的精神贵族……哎!斗争带来了多少副产品。我应该劳动去,去流汗、去晒太阳。这会对我有好处的。也许过去太抛头露面了,交际太广了,因此几乎不能动了。偶有所动,流言蜚语便接踵而来。对我加入“6·6”,外面都有些吃惊,好像不符合规律。扬子浪不是反“老孙”的吗?怎么保起“孙”来了?

李立春说:“扬子浪墜落成校文革的御用文人”,而赵琏英则说我屈服于校文革的压力。这帮混蛋,自己搞樊立勤失败了,精神上被“樊”征服了叛卖了自己的历史,跪倒在樊立勤脚下,还来讥讽别人,真是可笑、可耻。

潘世俊说我,像黑格尔一样,深刻的思想得出了软弱的结论。这种批评,看来有些道理。我在政治上毕竟还太软弱了。我常常在自己身上看到瞿秋白的影子。我要研究瞿秋白、憎恨瞿秋白、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这对我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

我应该前进,英勇地前进。我是无产者,没有什么可害怕丢失的。我要勇敢地奋斗,奋勇前进。

6月21日

昨晚,在燕南园63号传达了谢富治同志昨天中午的讲话。当然,讲话对我们一派是十分有利的,实质上取消了很多对聂孙的批判。讲话传达完后,“联战团”那些人得意洋洋,以为万事大吉了。聂元梓看来很焦急,又看重谈了一下整风问题。同样,我也对北大这次整风能否搞彻底而忧虑。北大的运动太复杂了,十几年来一直是是非之地,令人可畏。

6月27日

斗争呈拉锯状。让聂、孙作一个像样的检查是十分不容易的。

最近，重读《叶尔绍夫兄弟》，有一些体会。生活真是一个斗争的大漩涡。

上午“03秋收起义”一个人欺人太甚，屡次向我进行侮辱性的挑衅。迫于无奈，我进行了自卫，发生了一次一分多钟的格斗……他吃亏是罪有应得。我把他打了一个跟斗。他跌到水坑里去了（刚下雨不久）。

7月2日

北大就在这样不安的僵持状态中渡过了半个多月。29日孙蓬一作了一个检查。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态度诚恳。老孙是真正认错了。

这几天没干什么事情，过问了一下干部问题。认识了物理系一个“6·6”的头头，叫孟关霖。他对我很殷勤，常常来找我，缠着让我讲什么“光辉的思想”；还邀我一起上了几次馆子。复兴和广东对我与孟关霖为伍，而且如此“亲密无间”很不以为然。他们劝我要小心，说这个人不怎么样，有点油里油气。对他们的劝告，我自然很感激。小孟有缺点，但让我们断交显然不可能。

小孟有肖洛霍夫的书。我向他借了本《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读一下肖的书是有好处的。对内战我很厌恶，参战的劲头不大。

前几天，地院的几个兵团，公布了朱成昭及其同伙的反动言论的第一批材料，触目惊心。“大左派”朱成昭原来是一个这样的货色。怪不得彭小蒙说，十年以后她要写“左派内幕”了。

朱成昭的典型例子是值得深思的！！

7月10日

校文革召开了广播大会。聂元梓、孙蓬一分别作了工作布置。0、飘、方一小撮挑起武斗，冲击大会会场，围攻聂元梓同志，殴打孙蓬一同志，作出了露骨的表现。当晚我“新北大公社‘6·6’串联会”和“联战团”集会，对此强盗行径表示愤怒和抗议。会后在校园内示威，并在毛主席塑像前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心里特别闷，看着他们这批人不顾大局、不识大体在校园里横冲直撞，任意蹂躏党的政策，真是悲愤交加。文化大革命难道能以这种情况结束？凌晨2点，陈伯达同志到北大作指示。

7月12日

11日晚上，北京公社，红旗飘、革造一方面在五四广场召开大会，斗争陆平，制造假像；同时又积极调动队伍打、抢、抄“二组”、南阁“伏虎团”、“新北大公社”二支队、“工总支”等单位。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忍无可忍，但仍然以六·六通知为重，避免了大规模的武斗。11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在市革委会接见了聂元梓、孙蓬一等几位同志，对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了最大的支持。陈伯达同志说：天塌不下来，大家回去睡觉，要学会睡觉。又说，几个人就是要跟你们北大一万多人作对，又有什么办法呢？还说，昨天的讲话，你们看不懂，人家看懂了，人家知道不跳就活不下去了。陈伯达同志反复讲到：要学会睡觉。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很欣赏。

孙子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这种战法，是有力量的表现。老子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要保聂、孙。

孟关霖借了我《静静的顿河》，可以抽空看一下。

7月14日

昨天下午在圆明园苗圃劳动。手臂上给洋辣子（一种毛虫）咬了一大片，火烧针扎一般，疼痛难当。昨晚一宵难以入眠，今天上午就医后才稍见好转。

7月19日

去颐和园西南角一个分湖游泳，那儿水深二米多，因此水特别清澈，游泳者寥寥无几，十分惬意。

为了纪念《矛盾论》、《实践论》发表三十周年，我准备写几篇文章，探讨一下，在哲学上，毛主席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7月22日

最近几天，武汉三镇发生反革命兵变。在陈再道的策划下，武汉“百万雄师”绑架和围斗了谢富治和王力同志。两人皆被打伤，随从人员被杀。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出动了一千余辆卡车举行反革命的武装示威。狂呼：毛主席受蒙蔽了，江青靠边站、要揪出中央文革一小撮、打倒谢富治、王力，绞死余立金等，事态正在严重发展。戚本禹同志通知了首都四个代表大会，昨天冒着倾盆大雨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种声援活动要持续三天。昨晚，到全总去抓“百匪”，捕获六人，凌晨六时归。

7月28日

逍遥了几天，没有干什么事。

7月31日

家里来信，并寄来拾元钱，让我回家。说外面武斗成风，不安全，不如回家渡夏，云云。我自然是不愿回去的，就是真的要逍遥，也是待在学校里逍遥的好。

8月1日

昨天晚上，参加了三军在中山公园召开的“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游园庆祝大会”。

“新北大公社”新总部成立。我在作战组工作。

我觉得生活再也不能放纵下去了。无聊、睡觉、喝酒、抽烟，这样下去意志和朝气以及刻苦精神都会被磨掉了。我应该用工作来给生活作填料！斗争即幸福！

8月10日

最近看了愚人著的《红楼梦人物论》，很有启发。家里来信让我回去。我想等火车好走一些的时候，再回去。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一年，不忙。现在正是僵持阶段，可以稍事休息。

8月15日

最近北大气氛又有变化，沉闷得很。中央首长批评北大、限制北大。北京市这两大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令人费解。

我总预感到某种不幸和危险，总觉得聂元梓、新北太公社离中央文革越来越远。再看三、四个月吧，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最近，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猛斗肖华、崔田民，来势很凶。

8月21日

今天我冒险骑车进城买票，路上摔了好几跤，还撞了一个人。但因有孟关霖护送，总算没出大事。回来之后精疲力尽，相当后怕，连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事实。

晚上，聂元梓讲了5月27日中央文革对自己的批评，共三点。第一点，中央首长说北京两派是聂挑起的，武斗要聂负责。聂辩解，戚本禹不让聂元梓辩解，说：不许你讲。聂说：那我只好到公社去劳动了。戚说：你就是到公社去，还是要找你。会上，聂提起了关锋一月夺权时的那个电话，关锋矢口否认。

8月25日

昨晚到达上海。我这次离开北京，真有点落荒而走的味道。未走时心急如焚，可是上了火车，越接近上海，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聂元梓让人失望，她根本不能成为一个群众领袖，太容不下人了，太不联系群众了！跟聂走，没有意思。跟“井冈山”走，不可能。尽管我有很多观点是同意他们的，但要我马上改变立场，与过去的同志、朋友翻脸、和我所不齿的人们握手言欢，实在

愿意。不是我软弱、害怕舆论，害怕变化，问题在于这种变化不值得，到底有多大意思呢？有多少原则性的东西呢？李清照有诗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我如果轻易地过了江东，我的政治生命和威信还值几个钱呢？不如背水一战，临江自刎，完成自己的政治形象要好得多。

孙子说：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井冈山”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自持有后台撑腰，正是锋芒毕露之时。死顶硬撑绝无好处，不如暂避其锋芒、躲其锐气，将来伺机反扑为好。当然，如果大势已定，我也准备消声匿迹，退隐几年了。左思右想，反复推敲，还是三十六

计走为上。因此就在形势急转直下时我悄悄地走了。在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离开了北大。可是火车过了苏州，我就发愁了，离开了北大的斗争生活，到上海干嘛呢？真让人心焦。

8月29日

下午去浦东，浦江游泳场游泳。黄浦江水混浊至极，但潮水来时，漫江而上，却相当不错。“宁当先进的保守派”，“不当落后的造反派”。文革大革命的历史一向证明我是先进的。几乎在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每一个新发展前，我都有预感。我是“多思”，我对大革命是无愧的。我比那些政治斗争中的功利主义者、狭隘病患者要高出三倍。

“热风吹雨洒江天，冷眼向洋看世界”我现在就要当一当观潮派，要看一看目前潮流的来龙去脉。陈伯达同志说：阶级斗争要学会睡觉。“睡觉”耳聋目塞，不如观潮好，可以伺机而动。

9月2日

昨晚，得炜来寻我，长谈数小时，颇投机。他是到处追求生活，寻觅生活的人，总是带着文学的眼光来看生活，分析生活，相当恢谐。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文学上，他都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功利主义者。他说从学习书本到学习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轻视理想主义者。他装着一脑瓜子故事，讲起来，随手拈来，用以说明自己的观点。那个关于陆俊超和他的同学（女）的故事，饶是有趣。显然，炜对生活是相当满意的，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做他生活圈子里的一个强者。我觉得或迟或早这也会成为我的生活目的。这样就比较切实了，但也就没有锐气、没有创造性，没有不幸的动荡、纷扰和烦恼了。于是，也就没有生活的全部色彩缤纷了。哎，矛盾！讨厌透顶的知识分子习性。

不过暂时不要去分析、解剖自己吧，毫无意思，切实地去斗争吧，不要染上皮却林的坏习惯。^①

9月13日

^① 皮却林，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男主角。

这两天闲来无事，看看书，五花八门无所不读。

今天收到李重庵的来信，心中十分快活。历史终究要为被陷害者、被屈辱者平反，天大的冤屈也能得到昭雪。

看了上海影印的清华“井冈山报”上登的师大造反团115师的文章“林杰，革命人民对你的审判开始了”，不禁热泪夺眶而出。臭林杰，你也有今天！几个月来憋在心里的这股气终于出了。牛头山寨的老板娘也被揪斗了。两个月前，我们围斗过你、警告过你、预言有一天要在38楼斗你、而今如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是决不留情的。

当了四天外交部长的姚登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王力是外事口妖风的总根子，关锋在林杰事件中充当了可耻的角色，在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二十天前，我、于止生、李文、索世晖等人对形势的分析完全正确。在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关键时刻、转折关头，我跟上了大革命的列车。与那些投机家、帮闲者、无知的蠢驴以及趋炎附势的小人相比，我无半点愧色。唯一遗憾的是，我对胜利的形势作了落后的估计，对矛盾暴发的时机估计错误，认为还要二三个月之久，因此就回家避风头，铸成一件憾事。

10月2日

好久没在上海过国庆了。今年有机会与蜂拥的人群一起在南京路上看游行观烟火，别有一番滋味。前几天，看了一本摄影的书，并照了几张相片，效果还可以。

我厌恶上海，上海的风气让人讨厌，充满了实用主义，充满了势利眼，我受不了。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与实用主义的上海是格格不入的。

10月9日

快要离开上海了。50天来没有做什么事，只是看了书、下下棋而已，如此而已。

但是回京以后干什么呢？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应该怎样渡过呢？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呢？知识分子常有的忧郁折磨着我，我感到孤

独，尽管周围仿佛有很多朋友。我总是反复地苦苦深思，咬着牙、捏着头、准备粉身碎骨般地深思，琢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生问题。但是多么地令人失望啊！尘流滚滚，沧海茫茫，我如何把握得住啊！我像空中飘荡的柳絮一样，找不到一个依靠，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地方。

沉默、苦闷、我终会悟出一个道理：只有言行一致地实行彻底的马列主义，我才能摆脱知识分子的弊病，才能解释和承认世界。相反对违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事物，我就坚决抵制，与其斗争。我坚决拥护5·16通知。

（此处，有七行被我用浓墨涂黑，无法辨认。）

正好被忧郁统治着，恰巧读着高尔基的一段文字，录以备考。

我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可是已经从巨大的生活之杯中，饮尽了许多含毒的苦酒，这使我经常陷入非必要的深思。

我的忧郁恰如名为人类灵魂的本身，这是活在我胸中的原素，它常带着无倦的力量推着我向不知的前方迈进；永远不熄地从心头燃起对较好之事物的希望之火，谴责着求人之心，在斗争中夺去劫还了的童话的幸福。除了这忧郁之外，我还有饥渴着的青春。被饥饿和孤独时时迫成窒息的我的青春，这想接纳一切的事物，嘲笑我自己的未成熟的知识。我的青春正是我生活上最可爱，也是最危险的一部分。它是过于贪恋，不会作充分的辨味。恰如山羊一般，不会辨别烂叶和鲜美的芳草。

写着，写着夜深了，窒息般的沉默，在我的心头流进了无言的歌。仲秋过了，天一日凉似一日。户外的蟋蟀搬进了屋里，乘着夜色，奏响了他们那千篇一律的歌，单调、枯燥，令人生厌。比肃穆无声的沉默，还有寂静，还要让人窒息。

10月15日

22次快车误点了3小时，于昨晚10点半到达北京站。乘11路电车到达西直门后，32路已经没车了，只能步行回校，到校时已是清晨1点半了。因为是周末，有不少同学没有睡，谈了两个多小时，兴奋异常，直到早上4点多才躺下。白天劳碌了一天，洗被子衣服，臭虫又多，忙着灭虫。

上午任瑚琏来访，晚上王复刚来找我，说了一些情况令人振奋。

北京市各机关那一批被北大反对，而又反对北大的赫赫有名的左派们都彻底垮台了。学部联队的王恩宇、林聿时、潘梓年、吴传启、洪涛、刘郢、林杰及其老婆王乃英，关锋及其老婆周景芳，王力，姚登山，新人大公社的肖前（第一副社长）都完了。这帮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是变节分子。关锋可能是蓝衣社的，王力是托派，里通外国。总之，北京市隐藏着一个很深很大，十分狡猾的叛国集团，特务集团。这个集团，前一阶段骄横不可一世，曾经一度控制了北京市的运动。

戚本禹在中央文革作了两次检查，均未通过。（这是三军告诉我们的）最近在人民日报社，戚本禹说“新北大公社是个较好的组织”，陈伯达纠正说“是个很好的组织”。戚又说“它的战士革命性很强，他们保聂元梓，不是保她的缺点错误，不是她个人，是为了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同时，新北大公社在全市的威望也大增。地院派搞我们失败了。最近，北航、矿院等五校借谭震林问题搞我们，也宣告失败。原来天派的小学校纷纷向我们靠拢，要推举我们做首领，但我们的态度是“不介入”。北航、清华、矿院，以前对我们是三心二意：困难时，又想甩掉我们。王、关、林，问题暴露时，又乱冲乱撞，出风头，想抢头功。结果换得了严厉批评，也声誉大降。

蒯大富一向搞政治买卖，反覆无常也臭了，连28团都要反他。而清华414却倾向于保他了。28团曾来我校，要求支持他们反蒯，我们表示“不介入”。新北大公社是彻底的三军派，是三军最亲爱最亲密的战友。关系如此亲密，以致北大“井冈山”只好造谣，胡说什么“聂元梓与海直红联总的一位中将结婚了”，真有意思。

9月份以来，许多单位，中学四四派，学部革命派在新北大刷出大标语：新北大公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新北大公社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模范；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

但是最近北京形势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因素：

（1）清华414周泉纓贴出反陈伯达同志的大字报。指责陈伯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阐述”，“搞混了阶级队伍”。听说，民院的郑仲兵，清华的

蒯大富都有此观点。最近，蒯大富问北大：你们反不反陈伯达？如果反的，我马上就刷大标语“打倒陈伯达”。北大表示不反。反中央文革的势力正在滋长。

(2) 最近党校李广文贴了反康生的大字报。大字报一贴出，陈伯达马上赶到党校指出李广文是牛鬼蛇神，说这张大字报李广文是写不出来的。

(3) 9月7日师大专政委员会对谭厚兰的绑架完全把水搅浑了。另一个两面派，左右和影响了对林杰反党集团的斗争，以致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4) 大特务孙泐及其岳父卢正义，最近都突然死亡。又在安阳地区发现六部电台，其中有一部是师大的人安下的。谭厚兰这个人值得怀疑，很可能是毛主席司令部故意留下的，作为钓饵。大风暴还在后面。

9月1日三军曾对我们讲，让我们扮演一个软弱无力的角色，令人深思。最近又说，我们准备被打成“老保”，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事情。

10月18日

今天到工程兵勘察队生产基地劳动。我公社去了近400人，受到解放军同志的热烈欢迎。劳动结束回来时，我们爬上汽车，在车上频频回首，挥动着红色语录，向解放军同志致敬。解放军同志则打着红旗，列队相送，车开动了，他们还跟在后面，依依不舍地相送。一路上只要碰上解放军，不管是哪一个部队，我们都热情鼓掌，并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对方也热情鼓掌，十分融洽。真是民拥军，军拥民，新北大公社和解放军心连心。

今天外语红旗大队又和造反派武斗，形势紧张。北京市两派斗争还未结束。地质一派都相当硬，不知什么原因。北京市革委会和各区县革委会基本上是派性的。北市革委员会的实权实质上是掌握在林杰反党集团和特务集团手里，而5·16兵团远未破坏，又新出现了一个中国革命党，问题真复杂啊。

听说，关锋、林杰本来要当北京市的一、二把手，后来毛主席委任谢副总理当主任，他们的阴谋才未得逞。我怀疑他们打入并控制北京市革委会，是一个巨大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个阴谋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

10月28日

我公社对“井冈山兵团”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攻势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些效果，但不甚大。攻势刚开始时，兵团总部瘫痪，内部人心惶惶，分崩离析，稳不住阵脚，但近来突然强硬起来了，看来是有背景的了。

这次大联合的高峰中，我公社的政策不好，太直线式的了，不懂得迂回曲折。结果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我公社不愿联合，这是极大的政治损失。

近来从公社总部到普通战士，都预感到可能有反复。广大的公社战士准备在新的反复中夺得最后的胜利。

最近聂元梓同志说：全国形势大好，我校的形势也是很好的。但是，还会有反复，反复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文革大革命经过了一次大反复（关、王、林反党集团被揪出），再经过一次大的反复就能胜利结束了。

11月5日

心野得狠，根本坐不下来。那种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所喜爱的淡淡的忧愁浓浓地淹没了我的心灵。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软弱无能，悲观颓废的状态，成为一个坚强的斗士呢？

上午与王渊涛一起在校园里徘徊，东拉西扯，越谈感伤情绪越浓。

回顾了一年来的变化，深感自己堕落了。生活十分放荡，常常放纵地狂饮人生的苦味之杯，去追求各种低能的物欲的满足。吃、喝、睡、玩，不懂得也不会以劳动斗争来为人生加油了。从一个理科学子刻苦的、严谨的、勤奋的生活，变得像中文系学生那样放荡不羁了。

是什么挫伤了我学习、斗争、劳动的热情呢？是什么迫使我在物欲中去追求刺激呢？又是什么迫使我在无穷无尽的，像慢性毒药一样有害的颓废和悲哀中去寻求精神的满足呢？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还是我的社会地位，我诞生的那个环境所决定的。

我有高傲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压不服的。但是，我的感情太脆弱了，也太人性味了，拉不下情面来。有人深知我的习性，常常迎合我奉承我，用感情笼络我，而我也无以自解，只好被这种感情驱使了。反省、反省，我已经反省很多次了。而我却依然故我，依然软弱低能，颓废易感。我希望能换一个环境，这样也许会重新振奋起来。例如毕业或是下工厂，都比现在远好得多。

11月8日

这两天因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连看了好几部电影：《誓言》、《波罗的海代表》、《列宁在十月》。

11月10日

冬天到了。
落叶在脚下轻轻叹息，
天空充满愁容。
初冬的寒风盘旋着，
恶作剧地舞弄着几片飘零的枯叶。
那情侣们钟情的湖泊，
镀上了一层半透明的薄冰。
湖畔的小径也寥无人迹，
在寒风中徘徊，我的心像冰冻了一般。
(我默默无言)

11月18日

今天收到得炜来信，随信附入三张照片，都照得别有风趣。

傍晚，甚至是暮雾笼罩浦江的时候，江风习习，江水汨汨，显出一些微微的悲哀的情调来。

晚上看毒草片《舞台姐妹》，在艺术上也是很粗糙的，宣传艺术至上主义。无聊，很难与现代青年人共鸣！是牵强附会地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唱颂歌。但谢芳的演技不错，两只大黑眼乌溜溜地，特别有神，充满着艺术的语言。中国能与她匹配的女演员，除了秦怡，就别无她人了。

11月19日

上午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下午去师大、北航转了一圈，冷冷清清的。在某种意义上，文化革命刚刚是开始，当高潮狂热过去时，曾一度被表面的狂热

所掩盖住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就开始暴露，阻力就开始顽强地表现出来了。1958—1959年大跃进，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但这三年巩固和保卫了大跃进的成果。三面红旗的胜利决定于这三年经受住了考验。同样，目前文化大革命也开始进入严峻的考验时刻。我们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致力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

我们既要与赫鲁晓夫划清界线，同时也要与斯大林划清界线，就是要反对形而上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不然，必重蹈斯大林复辙。但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产生了很多偏激的东西，不符合我党几十年传统的東西，从露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极端的教条主义。对立的两派有时各执一端，闹得不可开交，使一些坚持党性立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不好处。

革命本身就是胜利，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可笑、甚至失败，但只要是革命，它在历史上总要放出光芒。前进吧，革命，唯有你能拯救人类！

11月27日

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我的政治水平、阶级觉悟都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飞跃。一年多来，思想情况基本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茅塞顿开，奋起造反，同时又受到大量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到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阶级观念的增强，但同时却往往走向极端，与教条主义、与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与保守思潮划不清界限；以至到现在既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观念，对共产主义长期以来的一些原则有清楚的认识，同时也开始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最新理论，最新解释。

在北大激烈的两派斗争中，偏激是无用的，不是马列主义的。我应该尊重自己的独立；相信自己根据毛泽东思想作出的结论。

11月29日

今天跟洪得炜写信，摘录如下：

…这已经是很久了，我开始与内心各种苍老的感觉搏斗，但愿能延长青春，但看来苍老是可阻挡的。…

我不知道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造成的大破坏，是会促使我奋起探索，去创造各种千奇百怪的新东西呢？还是被传统的东西的全面崩溃，吓得目瞪口呆？！以致最后沉沦、引退和颓废呢？

我常对各种事物充满厌恶；那种刚踏进青春时代的普遍的喜悦不见了。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兆头；因为任何一个稍能立足于世界的人，他的成功都是从憎恶、讨厌和批判开始的。

只是不要走向反面；不要失掉了平衡。应该保持某种意义上的和谐。太绝望了、太愤恨了，是会惹起社会公愤的。

12月4日

经常下围棋，下得头晕脑胀，废寝忘食。就是在梦里，还是黑子、白子的在那儿斗，今后应该加以节制。

（要）更加严谨、更加刻苦，孜孜不倦地去进行学习，斗争。

12月10日

这几天北大空气十分紧张，小磨擦、小武斗不断发生。公社对井冈山叫嚣的十二月风暴警惕很高，甚至有些神经过敏。12月9日的大规模行动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造成了把积累已久的政治优势丧失殆尽，反主动为被动了。昨天中午，公社几千人，在几个校文革老爷的指挥下，蜂拥而去，包围了25楼。以牛辉林之流包庇反革命为题，揪斗，殴打了牛、侯、谢纪康等人，并把这三人带走，在大饭厅又进行殴打、斗争。后来骑虎难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送往公安局，但后被井冈山劫走。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的小武斗。井冈山做大做宣传文章，俨然一副从困难环境中摆脱出来的模样。

显然，聂、孙等人都参加了12.9事件。孙蓬一甚至主张攻打28楼（王复兴说），难道能用盲动来解释他们的行动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12月15日

昨晚在办公楼参加了战斗团勤务组扩大会议。前新疆红二司文攻武卫总指挥，中文系学生任喜贵以生动的例子，孙子兵法语言阐述了在文攻武卫中应该注意的策略原则。他的讲话很有水平、艺术。讲得全场喜气洋洋、斗志昂扬，且相当发人深省。

他讲到要“攻心为上，攻城次之”；要多报伤亡、损失，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然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抓住时机反击，并举了中印边界战争的例子。讲到要一鼓作气，憋足士气；要打政治仗；所谓武斗，实质上是打政治仗。这个人看来政治上也是相当老练。

11日和今天，两次与“十一斗私批修班”交换观点，座谈。希望能与他们配合，使北大的问题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老实说，我对聂元梓还是有问号，摸不着底。特别是这几天的错误行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些影响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且处处表现了它的力量。十一斗私批修班怀疑公社里是否有坏人，对这几天的行动也相当不满。

12月22日

前几天，“0六教工支队”与“斯巴达克团”复课闹革命，并讲了第一课“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

当日下午“工程兵”等就对这一课发了六问，指出它代表了在文化革命中惨遭失败的资产阶级没落思想感情；影射林副统帅和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什么赫鲁晓夫上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下午参观北航301与103实验室。参观完后，找到了鲍渝，聊了一会儿，在她那儿吃饭。

上午参加系党章修改小组的活动。今后只要有空，都准备参加。

12月25日

由于公社总部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井冈山内部开始大乱，团、零势力与井红势力裂痕开始加深。井冈山兵团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过程中。这几天，我们与井冈山兵团广大战士进行了多次座谈、接触。

昨天晚上井冈山广播台广播了由杨克明起草的评论员文章，开始降调，并且宣布承认校文革，但是还是要求改组校文革。

同晚在25楼我们与“天安门论坛”进行了座谈，决定联合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今天经过一天的斗争，“天安门论坛”同意学习班在原则上注明接受校文革的领导，真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陈醒迈准备参加学习班）。

井冈山某些决策人突然发动的和平攻势；“天安门论坛”对我们的一让再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真是发人深思。

12月28日

“天安门论坛”变卦了，突然撕毁了已经达成协议的通告。

新北大井冈山广播台过去天天泼妇也似地骂街；一开始也颇令人注意，以为有多大的政治内容呢？但渐渐地也习以为常了；知道她不过是想骂人出气而已。但如果泼妇一反常态，变得温和起来，而且酸不溜儿地叫什么同志长、同志短，那简直要令人作呕了！

12月30日

元旦前夕，北大井冈山兵团采取了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突然行动：于今晚7点半绑架了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崔雄昆。等我们红一团闻讯赶到时，已经晚了。

当晚召开了新北大公社全体战士大会。校文革与公社总部强硬表态“崔雄昆我们保定了”，看来北大的斗争又被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在1968年开始时，将怎样过呢？应该怎样处理与“红梅”的关系呢？我应该学会正确处理好与同志的关系，应该小心谨慎，要尊重别人的感情和意见。同时与人交往应该有分寸，交往不宜过密；特别不能一时冲动，被一些人的感情所笼络。以致被人所控制、左右；在我的肩膀上应该长着一个自己的清醒的头脑。

一九六八年

1月1日

光辉灿烂的1967年过去了。更加伟大、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1968年来临了。我又将在新的一年里去接受新的考验和锻炼了。

1967年除夕晚上，我们“新北大”和公社总部孙云有、闫志胜、在38斋313室欢聚，大伙一块凑钱买了些水果，糕点、酒就聊开了。晚上9点半我们去观看了“胜利团”“抗大之歌”的排练。给他们提了些意见，很受欢迎。

就在我们参观“胜利团”的排练，并旁听他们的会议时，1967年就过去了，1968年来到了。

会后，我们又继续去了38斋313室座谈。回顾了1967年战斗的历程，展望了1968年革命的伟大前景，充分估计到了我们面临的一切艰难险阻。

什么应该是我大学生活的灵魂？那就是时刻准备，准备在自己的一生里去迎接伟大的社会风暴，准备在这场风暴中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

12月30日晚，北大井冈山绑架了崔雄昆同志。这是一起出乎意料之外的突然行动；这是与井冈山在最近采取的一系列和平攻势很不相称的一个动作。再联想到崔是市革委会批准的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行动是有着相当深的政治背景的。北大的斗争激化了，任何想不经过斗争，就轻易求得解决的幻想都是危险的。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新北大公社将在它成立一周年之际去迎接另一次大风暴，又一次大胜利。

1月10日

最近写了一篇大字报《评孔杨牛候保皇丑史的新篇章》以“新北大”名义发表了。不久，广播台和校刊都先后转播和转刊了这篇文章。

北大的斗争相当复杂。解决井冈山问题和校文革问题是一样困难的。对校文革的一些错误思想和错误领导必须坚决抵制，作合适的斗争。

1月14日

最近翻完了艾登回忆录，意思不大。12日参观了水利科学院水工所，接触了好多实际问题，很有收获，真是胜上十节课。

1月16日

昨晚公社在203召开串联会，我作了发言，还是有反响，好几位同学发言反对我的意见。看来经过这次串联会，我是作为策略派而彻底地亮相了。

今天晚上井冈山兵团一小撮，继下午抢走校文革办公室的公章之后，又乘今晚西藏大联指演出队来校演出期间，抢劫、偷盗了新北大广播台的几个喇叭，并挑起了大规模武斗。这雄辩地说明井冈山兵团内的极右势力对我们的进步、对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紧跟最新指示、狠抓大方向的行动怕得要命，吓得要死。竭力想打乱我们的步骤，重新挑起混乱。

要知道，没有混战，没有内战，井冈山兵团就要分裂，就要瓦解，就一天也不能存在。

晚上“西藏大联指”演出队的节目很成功。才旦卓玛也来校参加了演出，一共唱了十支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月17日

晚上在留学生食堂，由“红色进军号”等发起炮轰总部串联会。会议一开始就浸润在强烈的急躁和愤恨的情绪中，片面地强调公社在武斗中的损失，猛烈地指责总部“右倾”，粗暴地影射，不指名地攻击我“新北大人”和任善贵同志“出了许多鬼主意”，“幕后的决策人”等等。很明显，有许多人是上了“井冈山”挑动武斗的圈套了，是中了他们破坏我们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计了。他们已经忘了政治了，忘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了，忘了分析敌人的阴谋了，而一味想借“井冈山”挑起的1.16武斗事件来全面否定三论的大方向了，否定总部前一段时间的正确政策了。在这种极不民主的高压气氛下，我“新北大人”据理力争，稍许使一些感情用事者头脑清醒了一下。接着，中文系任喜贵同志作了长篇发言，真是洪钟力撞、中流击水。一时会场大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有跳上桌子的，有不让发言的，但在广大群众的鼓励下，任还是作完了这个“典型的右倾代表作”发言。很显然，孙蓬一们再也无法统一意见了。任的发言已经产生了

重大的政治影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思索。会议是成功的，事实表明，只要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风细雨地去做，新北大公社的派性一定会削弱的，新北大公社一定能在革命的大道上再前进一步。

阶级敌人打进来，利用派性挑动两派群众斗群众，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是当前国内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打倒派性，能不能步步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衡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准。

我将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坚决打倒派性，为在新北大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而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

1月22日

晚上与“胜利团”几位同志座谈，交换观点。

资产阶级思想，颓废、中庸，消沉、一股暗流在大学生中猖獗地泛滥着。潮流所向席卷了多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打扑克、打麻将，抽烟喝酒，高谈阔论，肆意放纵。一些好的风格、好的传统被破坏了。面对这股潮流该怎么办？顶！逆流而上，严以律己，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革命者。

再也不能让时间白白地浪费了。再也不能高谈阔论、到处游说，甘当御用文人了。在孙蓬一的错误政策还未彻底暴露时，我觉得唯一有效的是耐心等待，同时做一些和风细雨的串联工作，其余时间要抓紧学习，读一些书。

开了两个夜车，终于把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看完了，很有收获。只要革命，总是有阻力的，即使辛亥革命这样一个极不彻底的革命，也是有着巨大的阻力的。溥仪及其周围的保皇党徒，在辛亥年后的复辟活动是进行得何等顽固、何等猖狂、何等明目张胆、又是何等持久啊！他们何尝有一天放弃过他们的复辟希望啊！而即使在他那一个小圈子里，争权夺利的斗争又是何等勾心斗角、错综复杂啊！同时，此书也生动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冲击，和伪满洲国的滑稽丑剧。

1月30日

今年过年，真有些大吃大喝的味道了，29日中午，与孟关霖两人干了半斤青梅。晚上，我、孟、俞政、王渊涛、陈双基、孙云有、任瑚琏七人喝了一瓶白酒、一瓶葡萄酒、三斤花生、一斤半花生米、一斤瓜子。几个人借酒发疯，向孙云有对北大现状发了一通牢骚。孙云有是个好人，谦虚，朴实、好学、作风相当好。花生吃多了，消化不了，后来不禁呕吐起来，吐了满满一大碗。

下午接到洪得炜寄来的诗稿，躺在床上读着，读着，眼睛一热差一点流下泪来。

今天中午又与孟，胡丽贞一起吃饭。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死囚饭吧！死囚犯临刑前吃一顿好的，是为了今后再也不让吃了。我今年春节这样穷凶极恶地喝、抽、吃，也是为了今后再也不这样胡作非为了。我的决心越大，酒在春节也灌得越凶。应该告一段落了，应该改变我的生活面貌了。

春节过后，我一定要做到：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乱交朋友（空谈）。誓要把生命之弦绷紧让它发生铮铮之声，能奏最雄壮的战歌，让它强壮有力，能对敌人射出致命的箭。

我要恢复和发展我的优良作风，最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做到经常记日记，记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日记。狠狠地抨击和改正自己的弱点；在这种经常的认真的思想斗争中不断前进。

我要在群众两字上狠下功夫，努力向群众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断地锻炼和培养自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一起学习在战斗中前进的本领和能力。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又说“最有天才的人实际上是最有群众经验的人”。我要把这些教导铭记在心上。

我必须无情地改变自己的作风，改掉那个浪七浪八的样子。应该有一种朴实、诚恳的作风；憎恨那种夸夸其谈，指手画脚的作风。我必须改造我的语言，也就是从语言这个思想的直接体现改造我的思想。

那种言词偏激，每时每刻都力图一鸣惊人的连珠妙语，群众最可恨。那种演员风度，在群众场合顾盼自如，每时每刻都想显现自己所谓“大方”，最可悲，最轻浮。那种从言词出发，从理论出发，从感情出发的言论，必须统统禁止。必须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的言论，应该来自群

众，来自调查研究，来自对客观情况的正确分析。这种语言应该有淳朴的泥土气，有生动活泼的群众气息，为群众喜闻乐见。

一句话，要横扫我身上的一切洋气、学生气、资产阶级气。

应该抓紧时间，利用学生生活中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些书。

今年先读《世界通史》，《列宁言论摘录》等。争取把马，恩，列的一些的重要经典著作读完，再读完林彪文选。要不断结合形势活学活用毛著，反复体会毛主席最新指示，学习“两报一刊”和社论，参加群众讨论。努力向社会学习（上图：1998年5月，作者作为北美校友团的成员之一，回国参加北大百年校庆。某日晚，丁校长来到校友团下榻的宾馆，会见北美校友团，叙谈了几十分钟，并合影留念。这个宾馆在北大附近，现为颐和安缦酒店。丁校长当年是作者的“高等代数”的授课老师。），向革命形势学习，向着斗争中学习。同时，也要多看一些业务书，争取今年中英文过关。

在政治上广泛地参加各种活动交往，应该建筑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我应该把根须深深地扎到群众的泥土中去，不倦地向群众汲取营养。应该积极支持和参加班级活动，努力与班里同学团结好。在政治上，我的主要任务是改造主观思想，锻炼和培养自己的革命能力，要甘当群众的小老百姓。

2月2日

最近思想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反复，感到有约束自己、改造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必要了。这是一个好事，但也不能复旧，不能搞修养的老一套，搞一种“目的是没有的，修养就是一切”的公式。

我们改造思想，并不是让思想去适应现状，去适合落后习惯；（去适合）几千年的旧势力。而是要与现状抗争；要改造现状，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要不断地培养自己的辩证法观念，要清醒地意识到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的过程；不要去承认庞大的，貌似永恒的旧事物，这不是唯物主义，这是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要有历史的预见，要看到历史的不断更新。

改造思想绝不是为了去适应貌似强大的旧法则、旧规律、旧法权，而是为了埋葬旧的，去迎接和创造新的。现实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都必须无情地加以蔑视，勇敢地加以蔑视，不管它有多大的舆论、多猛的气势，只要它脱离

了毛泽东思想，那么它只不过是时髦一时的词句，是对毛泽东思想恶意地剽窃、篡改和歪曲。必须赤裸裸地撕下它的画皮，不许它玷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名字。



左图：1998年5月，作者作为北美校友团的成员之一，回国参加北大百年校庆。某日晚，丁校长来到校友团下榻的宾馆，会见北美校友团，叙谈了几十分钟，并合影留念。这个宾馆在北大附近，现为

颐和安缦酒店。丁校长当年是作者的“高等代数”的授课老师。■

本文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 zk1408c、zk1409a、zk1409c

本刊经作者授权转载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